分类号 I207.22

密　级 公开

学　号 150903

陕西师範大學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硕士学位论文

（学术型）

题　目 中唐诗歌中的盛唐书写

作　　者 黄月芬

指导教师 魏景波 教授

一级学科名称 中国语言文学

二级学科名称 中国古代文学

提交日期 二〇一八年六月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本人或他人已申请学位或其他用途使用过的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谢意。

本学位论文若有不实或者侵犯他人权利的，本人愿意承担一切相关的法律责任。

作者签名：黄月芬　　日期：2018 年 5 月 31 日

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及使用授权声明书

本人在导师指导下所完成的学位论文及相关成果，知识产权归属陕西师范大学。本人完全了解陕西师范大学有关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允许本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纸质版和电子版，有权将本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任何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论文。本人保证毕业离校后，发表本论文或使用本论文成果时署名单位仍为陕西师范大学。

保密论文解密后适用本声明。

作者签名：黄月芬　　日期：2018 年 5 月 31 日

摘 要

论文着眼于中唐诗歌中的盛唐书写，试图考察中唐诗人缘何书写盛唐、书写了盛唐的什么内容、是怎样书写的、有何影响。

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的缘由及意义、研究思路、研究现状等，并对“中唐”、“盛唐”进行界定。正文试从以下方面论述中唐诗人对盛唐的书写：

第一章，分析中唐诗人书写盛唐的缘由。一是时代因素，盛唐的繁荣给中唐诗人留下深刻的记忆，尤其是经历过盛唐的中唐诗人；对未经历盛世的中唐诗人而言，盛唐社会既是他们遥不可及的梦想，又是需要引以为戒的对象。中唐社会的各种弊端亟待铲除，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政局的混乱都是威胁社会稳定的因素，因此他们希望借盛唐的倾颓给统治者以警示。二是个人遭遇，安史之乱后，中唐诗人的命运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试以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为代表分析个人遭际对中唐诗人书写盛唐的影响。

第二章，分析以怀念为主的盛世再现，即展现盛唐书写中盛世“记忆”的丰富内容，主要包括盛唐盛事书写、故地书写。盛世再现中蕴含着中唐诗人浓厚的盛世情结，是他们怀念盛世的情感表达，其中又表现出无限的悲戚。在盛事书写、故地书写中，都涉及到了李杨故事的书写，这一书写既有对盛世繁华的再现，又有对二人的同情、批判等态度，影响着“杨贵妃”文学母题的形成与嬗变。

第三章，分析以批判为主的盛唐书写，即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诗人对盛唐的书写。元稹、白居易书写盛唐主要是反思盛唐由盛转衰的原因，从而借古讽今，针砭时弊。他们的盛唐书写主要包括盛唐战事、胡舞与胡乐、将相任用三方面的书写。

第四章，分析盛唐书写的意义和影响。中唐诗人书写盛唐是咏史怀古主题的延续，体现着时、地、人、事的结合，流露出浓厚的感伤情绪。诗人对李杨故事的书写也促进了“杨贵妃”文学母题的形成与嬗变。此外，大历诗人对盛唐的感性书写，元、白对盛唐的理性书写，是受时空距离的影响，又是诗人功利性书写的表现，也影响了晚唐诗人咏史怀古诗的创作。

关键词：中唐诗歌，盛唐书写，怀念，批判，母题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writing of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in the poets of middle Tang Dynasty, and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why the poets wrote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what content they wrote about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how it was written, and what the influence was.

The thesis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introduction, text and conclusion.Introduction mainly introduces the reason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opic, research ideas, research status, and defines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and prosperous Tang Dynasty.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poets' writing of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first chapter analyzes the facts that impel the poets i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to write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Firstly, the prosperity of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left a deep memory to the poets of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especially the poets of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who had experienced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And to the poets who had not experienced the prosperous times,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society was their distant dream and also need to learn a lesson. The malpractices of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need to be eradicated urgently. Eunuchs' dictatorship, the separation of towns and political chaos are the factors threatening the social stability. Therefore the poets i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hope to warn the rulers by the declination of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Secondly, personally experience, the fate of poets in the mid-Tang Dynasty was affected to varying degrees after the An-shi Rebellion. This paper takes Wei Yingwu, Liu Yuxi and Bai Juyi as representatives to expound that personal encounter is also the reason for writing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The second chapter analyzes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prosperous times mainly in memory, that is, the rich contents of the memory of the prosperous times in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mainly including the writing of the prosperous events and the old place in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prosperous times contains the rich feelings of the poets of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which is the emotional expression of their nostalgia for the prosperous times, and it also shows

boundless sorrow.In the the writing of the event and the old place , it involves the writing of Li and Yang's story. This writing not only reappears the prosperity of the prosperous times, but also shows the attitudes of sympathy and criticism to the two person .It affect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about literary motif of Yang Kwei Fei.

The third chapter analyzes the criticize writing of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which is represented by Yuan Zhen and Bai Juyi. Yuan Zhen and Bai Juyi wrote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is mainly to reflect on its prosperity to decline, so as to make the use of the ancient to satirize the present.Their writing in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mainly included three aspects: the war, Hu Wu and Hu Yue, also the general appointment.

The forth chapt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of the writing of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The poets of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wrote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theme of history nostalgia, which reflects the combination of time, land, people and events, showing strong sentimental feelings.The poet's writing of Li and Yang's story also promoted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Yang Kwei Fei's literary motif. In addition, the perceptual writing the poets of Dali is perceptual to write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but Yuan Zhen and Bai Juyi is rational. The reason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time and space. This change is als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oet's utilitarian writing, and affects the creation of the poems about the history nostalgia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poetry i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writing of the prosperous Tang Dynasty, nostalgia, criticism, motif

目 录

摘 要.....I

Abstract.....III

绪 论.....1

第一章 中唐诗人书写盛唐的缘由.....7

第一节 盛唐之昌盛.....7

第二节 安史之乱后的中唐社会.....9

一、宦官专权.....10

二、藩镇割据.....12

三、政局混乱.....14

第三节 人生遭际的影响.....15

第二章 以怀念为主的盛世再现.....19

第一节 盛唐盛事之书写.....19

一、千秋节.....19

二、玄宗游幸华清宫.....21

三、皇帝赐宴.....22

第二节 盛唐故地之书写.....23

一、两京行宫之书写.....23

二、盛唐寺观之书写.....25

第三节 盛世再现中的悲戚.....26

一、盛世不再的哀伤.....26

二、故交零落的孤独.....28

三、时移世易的无奈.....29

第三章 以批判为主的盛世书写——以元、白为代表.....31

第一节 中唐诗歌中的盛唐战事书写.....31

第二节 中唐诗歌中的盛唐之胡舞与胡乐.....34

第三节 中唐诗歌中的盛唐之将相任用.....36

第四章 盛唐书写的意义和影响.....41

第一节 咏史怀古主题的延续.....41

一、咏史怀古主题的延续.....41
二、时、地、人、事的结合.....43
三、感伤基调的呈现.....44
第二节 “杨贵妃”文学母题的形成与嬗变.....45
一、“杨贵妃”成为文学母题的原因.....46
二、“杨贵妃”文学母题的嬗变.....48
第三节 以情为主到以理为主.....53
一、时空距离的影响.....54
二、“功利性”书写的表现.....56
三、对晚唐咏史怀古诗作的影响.....57
结 语.....59
参考文献.....61
致 谢.....65

绪 论

一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唐诗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自初、盛、中、晚唐诗歌划分提出之后，盛唐诗歌研究最为专业学者所青睐。对中唐诗歌的研究，论著虽已不胜枚举，但仍有可供探讨之处。中唐诗歌在盛唐诗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虽然没有盛唐诗歌那样光彩夺目，却同样出现了元白、韩孟这样的大家。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唐的诗歌时常流露出对盛唐之世的向往、怀念，且兼有以史为鉴之思考。将中唐诗歌与盛唐之世联系起来，寻找它们的连接点，探讨中唐诗人在面对消逝的盛唐之世是何种反应，又是怎样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思路。

唐玄宗统治时期的开元天宝时代引发后世文人的无限感慨，而中唐作为盛唐之世在时间上的延续，时代上的接近使得中唐文人对盛唐的体会也应更为深刻，加上盛唐因安史之乱的爆发一去不返，也为中唐提供了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唐文人在这一层面上的感悟则更是其后时代难以企及的。大历时期的一些诗人作为盛唐繁盛之世的见证者，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追忆盛唐？又是怎样追忆的？而大历之后的中唐诗人，如元稹、白居易等，他们只能从前人的记载中获得关于盛唐的资料，毫无盛唐记忆的他们也对盛唐有为数不少的书写，他们的书写作为一种“遥想”，又是怎样的？盛唐的风云人物、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世态风情等等，在他们的眼中，在他们的笔下是何种面貌？他们的作品中又流露出了怎样的情怀？是遗憾惋惜，还是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诚惶诚恐？对盛唐的书写于后世有何影响？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我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和动力，这是选此题目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以中唐诗歌中的盛唐书写为切入点，有一定的创新性，这也是选题的意义所在。从这个角度对中唐诗歌做进一步的研究，不仅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唐代社会，而且可以从另一层面发掘中唐诗歌的价值。中唐诗人对盛唐的追忆和遥想影响了其后有关“咏史怀古”主题的文学的创作。其中对李杨爱情故事的书写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和灵感，促进“杨贵妃”文学母题的形成和嬗变。从盛唐书写对后世的影响这一方面展开论述的研究并不多，本文力求有所收获，这是选题的意义之二。

论文采取的研究方法以分析和阐释为主，结合诗人所处时代和自身经历，诗

史互证，分析诗歌中的盛唐书写。中唐诗人对盛唐的书写以怀念和批判两种态度为主。其中大历诗人如韦应物等因经历过盛唐之世，因此对盛唐怀有特殊的情感。在书写盛唐时，再现盛世辉煌，包括盛唐的盛事、故地等。大历之后，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诗人在书写盛世繁华的同时，更多的是以史为鉴的反思和批判。中唐诗人对盛唐的书写涉及较多的盛唐人、事，地，从大历诗人的追忆到其后诗人的遥想，是对咏史怀古主题的延续，情感态度上经历了以情为主到以理为主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唐诗歌中有很多作品涉及对李杨故事的书写，以白居易的《长恨歌》影响最大。自中唐后，诗人、传奇作家、曲作家等先后以李杨爱情故事为题材，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也使得“杨贵妃”这一文学母题逐渐形成并不断变化。

二

关于“中唐诗歌中的盛唐书写”这一选题，在此之前极少被论及。以此为出发点的论文有2015年西北大学武文娟的硕士论文《中晚唐诗歌中的盛唐记忆研究》[①]。该文从盛唐记忆产生的缘由谈起，分析了中晚唐诗歌中盛唐记忆的丰富内容，包括故人、旧地、遗物等方面，最后对盛唐记忆的普遍悲剧性进行论述。文章的选题很有新意，包括从心理学角度对记忆产生的机制进行分析，属于跨学科研究，但是对于“记忆”一词，作者并没有进行细致的思考。文中讲到“记忆并非凭空产生”，此说毋庸置疑。依照此说，那么中晚唐诗人中只有经历过盛唐的才可能产生盛唐记忆，否则他们的记忆岂非“凭空产生”？晚唐诗人自不待言，不可能经历过盛唐之世，中唐诗人也有“经历过盛唐之世”和“未经历过盛唐之世”的区别，前者可以产生盛唐记忆，后者只能根据史书、文学作品中获得的信息对盛唐进行“遥想”，这样一来，他们对于盛唐的书写自然有所不同，然而作者并未对此进行区分。这是其论文的不足之处。

2017年陕西师范大学尹林的硕士论文《论杜诗的“追忆”倾向》[②]探讨了杜甫追忆倾向形成的三种心理机制，论述了杜诗中的追忆成分与杜诗集大成之形成的关系，并分析了白居易诗歌对杜甫追忆倾向的呼应，这是从文学接受方面考察杜甫追忆倾向的后世影响。其中作者将杜甫追忆诗中体现的时间观念概括为“冷静的时间观念”，这可以说是一个新颖的提法。文章结合相关诗学理论对杜甫有关追忆的诗歌进行了阐述，如果能对这些诗歌加以归类分析，文章应更为清晰和全

① 武文娟：《中晚唐诗歌中的盛唐记忆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② 尹林：《论杜诗的“追忆”倾向》，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面。

其他涉及此种研究角度的论著如宇文所安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①]讲述回忆这种心理活动在文学创作中，特别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和欣赏中的功用。内容包括：黍稷和石碑：回忆者与被回忆者；骨骸；断片；回忆的引诱；复现：闲情记趣；为了被回忆等。其中《黍稷和石碑：回忆者与被回忆者》一节对于古典文学中的回忆书写独具慧眼，作者进行了引人深思的论述“通过回忆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回忆的对象，成为了值得为后人记起的对象”。

吴振华的《凄凉落寞中追忆盛唐之舞——读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②]是以杜甫作品为例，分析诗人对盛唐之世的追忆。

2005年复旦大学李翰的博士论文《汉魏盛唐咏史诗研究——“言志”之诗学传统及士人思想的考察》[③]梳理了从汉魏到盛唐的咏史诗脉络，发掘其中的言志诗传统，有通古博今之气势。

2007年华侨大学胡杏的硕士论文《论晚唐诗人的历史情结》[④]由晚唐大量的咏史诗出发，对晚唐各类诗作中反映出的晚唐诗人历史意识进行归纳分析，探讨其历史情结深层次的成因与内涵，以求窥探晚唐社会心理。

2011年漳州师范学院潘东晓的硕士论文《唐代怀古诗研究》[⑤]主要从怀古诗的界定谈起，进一步分析初、盛、中、晚唐怀古诗兴盛的原因及文本特色。

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郑琛的硕士论文《现实与追忆——长安、金陵与唐诗人的都市文化心态》[⑥]也属于怀古诗的范畴，结合了长安、金陵两大古都对唐代诗人的都市文化心态进行研究，涉及文学与地理的关系，很有创新意义。

2015年陕西理工学院郭倩的硕士论文《唐代登临诗研究》[⑦]对唐代登临引发的咏史怀古等情感进行分类研究，拓宽了唐诗研究的题材。

从盛唐情结这一研究角度出发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张倩《论杜甫晚年诗中的长安情结》[⑧]（《杜甫研究论集》）分析长安情结在杜甫诗歌中的意义。黄伟《张祜宫词中盛唐情结的文化阐释——兼谈晚唐诗作中的“马嵬”意象》[⑨]，从张祜诗

---

① （美）宇文所安著，郑学勤译：《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② 吴振华：《凄凉落寞中追忆盛唐之舞——读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古典文学知识》，2012年第2期。

③ 李翰：《汉魏盛唐咏史诗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④ 胡杏：《论晚唐诗人的历史情结》，华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⑤ 潘东晓：《唐代怀古诗研究》，漳州师范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⑥ 郑琛：《现实与追忆—长安、金陵与唐诗人的都市文化心态》，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⑦ 郭倩：《唐代登临诗研究》，陕西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⑧ 张倩：《论杜甫晚年诗中的长安情结》，《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9期。

⑨ 黄伟：《张祜宫词中盛唐情结的文化阐释——兼谈晚唐诗作中的“马嵬”意象》，《枣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歌中的“马嵬”意象出发，论述张祜的盛唐情结。2013 年陕西理工学院倪超的硕士论文《李杨故事的唐诗书写及其影响研究》[①]从内容、主题、影响等方面研究李阳故事在唐诗中的呈现。2010 年中山大学陶成涛的硕士论文《唐代曲江诗研究》[②]一文以曲江为中心，对唐代曲江诗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

综上所述，关于“中唐诗歌中的盛唐书写”这一选题，研究成果并不多。针对该选题，本文研究思路拟先从中唐诗歌的整体研究概况出发，对中唐的社会政治、文学有较为全面的把握之后，再研读中唐代表性诗人及其作品，分析其中的盛唐书写。

三

文学史上通常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这种说法源于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体》[③]。严羽按照时间顺序将唐诗分为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到了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④]中才出现对唐诗四个分期“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明确概括。徐师曾修正了《唐诗品汇》的分期，在《文体明辨序说》中称：“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为初唐；由开元至代宗大历初为盛唐；由大历至宪宗元和末为中唐；自文宗开成初至五季为晚唐。然盛唐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⑤]清人冒春荣在《葚原诗说》卷三中对此作了补充，即把中唐的下限划到文宗大和九年：“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戊寅岁到玄宗先天元年壬子岁（618-712），凡九十五年；盛唐自玄宗开元元年癸丑岁至代宗永泰元年乙巳岁（713-765），凡五十三年；中唐自代宗大历元年丙午岁至文宗大和九年乙卯岁（766-835），凡七十年；晚唐自文宗开成元年丙辰岁至哀帝天祐三年丙寅岁（836-906），凡七十一年，溯自高祖武德戊寅至哀帝末年丙寅，总计二百八十九年，分为四唐。”[⑥]至此，初、盛、中、晚唐的分期才算明了和完整，这一分期也得到了当代学者的普遍认可。

因此本文参考唐诗的传统分期，结合写作需要，依照文学上的划分，将盛唐的起止时间确定为开元元年至永泰元年（713-765），中唐的起止时间确定为：大历元年至大和九年（766-835）。

---

① 倪超：《李杨故事的唐诗书写及其影响研究》，陕西理工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② 陶成涛：《唐代曲江诗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
③ （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689 页。
④ （明）高棅编纂，汪宗尼校订，葛景春、胡永杰点校：《唐诗品汇》，中华书局，2015 年版，第 7 页
⑤ （明）徐师曾著、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07 页。.
⑥ 郭绍虞编选、富寿荪点校：《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版，第 1607 页。

这里涉及到杜甫的诗歌是否是中唐诗的问题。文学史上通常将杜甫作为盛唐诗人的代表，与李白并提，这一观点历来被普遍认可。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认为杜甫应列为中唐诗人，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即持此种观点。

从诗歌创作数量上看，杜甫自 759 年弃官至 770 年去世的十一年时间里写了 1100 多首诗，尤其是 766 年到夔州之后，不到两年时间写了 430 多首诗，约占其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一。杜甫的大部分诗歌都是作于安史之乱后，且其沉郁顿挫的诗风在这些诗歌中也有突出表现，但是也不能据此断定杜甫就是中唐诗人。

从时间上看，中唐的起止时间是代宗大历元年至文宗大和九年（766-835），杜甫生于 712 年，去世于 770 年，只有生命的最后几年隶属于中唐，将杜甫作为中唐诗人显得牵强。从杜甫和同时代诗人的交游来看，杜甫的交往对象李白、高适、王维等，都属于盛唐诗人，且后来的李杜并称足以说明杜甫在盛唐诗坛上的地位；从诗歌艺术创作上来看，杜甫的诗歌充满雄浑壮阔之美，风骨与声律兼备，境界阔大、格调高昂，与中唐的气骨顿衰、低沉苦闷、幽微内敛截然不同。安史之乱后，盛唐虽然不复存在，但是诗歌在盛唐所形成和积淀的盛唐气象依然存在，杜甫作为唐诗的集大成者，诗歌创作转益多师、兼收并蓄，与盛唐兼容并包的气度相一致，其诗歌正是盛唐气象的反映。如果将杜甫划入中唐，那么盛唐气象必将黯然失色。

综合以上观点，本论文中，杜甫的诗歌不列为中唐诗歌，不作为论述对象。需要说明的是，杜甫作为盛唐时期的诗人，对盛唐怀有深厚的感情，也创作了不少怀念盛唐的诗歌，加上其诗歌兼具“诗史”性质，因此在论文写作中也会引用杜甫诗歌作为旁证进行阐述，但并不是将杜甫诗歌作为中唐诗歌来论述。

第一章　中唐诗人书写盛唐的缘由

“时代是诗歌创作的主要源泉之一，诗人的创作灵感和动因来自于时代对人们心灵的种种有形和无形的影响。”[①]无论是大历诗人对盛唐的追忆，还是其后诗人对盛唐的遥想，都与诗人所处的时代分不开。大历五年（770）和大历七年（772）杜甫和元结相继去世，以韦应物（约 737-约 793）、顾况（约 727-约 820 以后）[②]、李益（748-829）、大历十才子等为代表的大历诗人开始活跃于中唐诗坛。他们中不少人的青少年时期在盛唐度过，同时经历了安史之乱，许多诗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痛，个人命运的不幸更加触发了他们对昔日盛唐的回忆。深刻的太平盛世记忆使他们对盛唐的追忆饱含真挚的情感，这也是他们在颠沛流离、郁郁不得志时的慰藉。他们书写盛唐的诗歌中不仅有对盛唐气象的怀念，也传达着他们对盛世回归的渴望。他们之所以书写盛唐，一方面是盛唐所呈现的恢宏气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促使他们用诗歌来记录这些盛世记忆。另一方面，安史之乱后，中唐的社会现实着实堪忧，身兼文学家和政治家双重使命的诗人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试图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于是在诗歌中借盛唐由盛转衰的历史劝谏统治者。

第一节　盛唐之昌盛

玄宗统治初期励精图治，虚心纳谏，广纳英才，思想开明，使李唐王朝达到全盛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高度发展，出现了继贞观之治之后的第二个盛世局面，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表现：

其一，物阜民丰的盛唐经济。开元时期，经济达到全盛，唐玄宗不仅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而且体恤百姓，轻徭薄赋，使生产发展，人口增加。这些繁荣景象从唐代诗歌中即可窥见，王维有诗“万户千门应觉晓”[③]，杜甫也有“城中十万户”[④]之句，大历诗人李端也无不感慨地说：“忆著长安旧游处，千门万户玉楼台。”[⑤]杜甫曾在《忆昔二首》其二中对开元盛世进行描写：“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

① 霍松林、傅绍良：《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3 页。
② 参赵昌平：《关于顾况生平的几个问题》，载《苏州大学学报》1984 年第 1 期。
③ （清）赵殿成笺注：《王右丞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 年版，第 193 页。
④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2178 页。
⑤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 214 页。

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①]除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外，盛唐时期的商业、手工业也大大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出现了长安、洛阳两大经济中心。唐人郑棨在《开天传信记》中说：“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奇瑞叠应，重驿麋至，人情欣欣然。”[②]经济的繁荣为政治的稳定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使盛唐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

其二，清明昌盛的盛唐政治。玄宗统治初期锐意革新，知人善任，重用姚宋等贤相组建自己的“智囊团”。当时的每个宰相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资治通鉴》载：“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③]其中贤相姚崇在武则天和睿宗统治时期，历任宰相，有丰富的治国经验。这一批肱骨之臣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向玄宗建言献策，劝谏玄宗吸取隋亡的教训，以史为鉴，探索能让大唐王朝长治久安的治国模式。除此之外，玄宗坚持以法度治理天下，不断完善法律制度，施行仁政，赏罚分明，不徇私枉法，树立法律威信，使国家法制严明。《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之有天下也，纠之以典刑，明之以礼乐，爱之以慈俭，律之以轨仪。”[④]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问题上，主张安抚四夷，以礼相待，与各民族和平共处，保证边疆地区的安定和睦。唐人诗歌中对盛唐明君贤臣多有赞誉，李白的“群才属休明，承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⑤]，王湾的“圣主万年兴，贤臣数载升……三杰贤更穆，百僚欢且兢”[⑥]……从这些诗句中就可看出政治清明与人才济济是盛唐政治极为突出的特征。开元年间，唐朝的军事力量也十分强大，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

其三，登峰造极的盛唐文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盛唐文化正是在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才得以达到顶峰，开创盛唐之气象。玄宗采取开放多元的文化政策，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重视礼乐文化，使盛唐文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盛唐文化兼容并包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儒释道三教并行，出现了三大代表性诗人：儒家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诗圣杜甫、道教文化影响下的诗仙

①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40页。
② （五代）王仁裕等撰，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825页。
④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6页。
⑤ 瞿蜕园、朱金城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
⑥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71页。

李白和深谙佛教禅理的诗佛王维。他们是盛唐文化的代表，也是唐诗高峰的代表。盛唐文学艺术蓬勃发展，书法、绘画等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出现了颜真卿、张旭、吴道子这些难以超越的大家。乐舞方面，玄宗本人就是乐舞爱好者，相传中西结合的盛唐法曲《霓裳羽衣曲》的就是由玄宗创制和改进。

盛唐宽松的文化政策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也为盛唐文人提供了诗文创作的有利环境和创作灵感，出现了以诗歌为代表所反映出来的“盛唐气象”。最早以“气象”一词评诗的不是严羽，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阐述的诗学理论是建立在“气象”与盛唐诗歌的基础上，学术界公认是严羽首倡”盛唐气象”，以此来形容盛唐诗歌在表现手法、思想感情、创作手法、语言艺术等方面所表现出的整体风貌，即盛唐诗歌的兴趣妙悟、雄浑深厚、自然混成[①]。现在我们所说的“盛唐气象”意蕴更加丰富，往往是时代精神和艺术风貌的综合反映，是盛唐诗人豪气冲天、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的概括性表达。

经济文化的繁荣、社会的安定统一和君王的锐意图治给了士人信心和希望。盛唐文人在这样的盛世中，政治热情高涨，胸怀天下，一心报效国家，既有李白的“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②]，又有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③]。他们心系天下，渴望通过辅佐君王，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种朝气蓬勃的盛唐风貌给中唐诗人以极大的精神鼓舞。他们在诗歌中高唱：“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④]，恨不生同时。

正因为盛唐的辉煌带给后世诗人梦幻般的记忆和想象，所以盛唐的瞬间倾颓让他们猝不及防，使他们的个人命运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生理想也随之破灭。对社会现实的失望笼罩着中唐文人，使他们再也没有了盛唐的积极向上。他们在诗中书写盛唐的种种繁华，表达对盛世的怀念和遥想，痛定思痛之后也不断反思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第二节　安史之乱后的中唐社会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但是带给唐王朝的是几近毁灭性的打击，自此以后唐王朝开始走下坡路，社会动荡、人心惶惶，中唐一开始即伴随着深重的社会灾难。《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记载了安史乱后河北、河南满目疮痍的景象：

---

① 霍松林、傅绍良：《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② 瞿蜕园、朱金城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25页。
③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6页。
④ （清）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下册，第517页。

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①]

《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唐纪》三十九记载：

今师兴不息十年矣，人之生产，空于杼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髓。长安城中白昼椎剽，吏不敢诘，官乱职废，将堕卒暴，百揆隳剌，如沸粥纷麻，民不敢诉于有司，有司不敢闻于陛下，茹毒饮痛，穷而无告。[②]

生活在大乱初平时期的大历诗人惊魂甫定，沉浸在令人失望的社会现实中，还来不及思考社会剧变的原因，加上政治热情的消退，面对复杂的政局，他们多采取消极的态度，无心过问政治。虽然安史之乱后社会局势整体趋于安定，但是各种社会问题依然层出不穷，宦官专权，奸佞当道；藩镇割据，战乱频仍；党争不断，政局混乱。德宗统治期间采取一些列深得民心的政策，使唐王朝出现中兴的迹象，士人的政治热情逐渐被激发。贞元后期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有识之士渴望通过改革实现国家的复兴，因此积极参与变革。至元和年间，以元稹、白居易等为代表的士人，身兼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们可以以文人的眼光看政治，通过诗文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从而使文学发挥它在政治上的“时效性”，达到针砭时弊的目的。

如果说大历诗人对盛唐的书写着眼于盛世繁华的再现，那么元、白等诗人对盛唐的书写则着意选取盛唐之世的弊端，通过借古讽今来引起君王的重视，推动社会变革。他们在新乐府中涉及较多对盛唐的书写，这些书写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即为了达到“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目的。元白在新乐府中书写盛唐人事，极少有歌功颂德的。盛唐的由盛转衰，在他们眼中是必须引以为戒的，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衰颓的命运。论文试考察中唐的历史背景，了解中唐社会亟待解决的种种弊端，以此来分析元、白书写盛唐时批判、讥讽态度的生成原因。

一、宦官专权

中唐时期威胁政局稳定的首先是宦官专权。宦官专权首先体现在宦官地位的上升。肃宗、代宗统治时期，宦官李辅国权倾朝野，尽管代宗对其行径十分不满，仍尊其为“尚父”，在他死后“仍赠太傅”。[③]顺宗、宪宗时期的宦官仇士良、王

①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57页。
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173页。
③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61页。

守澄等自称“‘定策国老’，目天子为门生”。[①]

其次是宦官对军政大权的掌控。肃宗时期，宦官鱼朝恩被特立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并专领神策军，相当于统领各军。“观军容使名，自朝恩始也。”[②]唐代宗即位后，李辅国和程元振有定策之功，竟上奏：“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③]可见宦官对皇权的觊觎已到了妄图独揽大权的地步。至德宗，命窦文场和霍仙鸣分管神策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④]神策军是唐王朝最重要的禁军，负责保卫京师和宫廷、参与征伐，是朝廷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对维护统治至关重要。而德宗时期神策军权全归宦官，可见皇帝对宦官的倚重。

最后是宦官对皇位继承的直接干预。唐代中后期，由宦官决定皇帝的废立的情况日甚一日，唐代宗的即位即是得益于李辅国的拥立。在肃宗病危期间，张皇后企图联合太子诛杀宦官，李辅国闻讯后，“即伏兵凌霄门，迎太子，伺变，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辉光、马英俊等囚之，而杀后它殿。”[⑤]《新唐书》卷二〇七载：“始，士良、弘志愤文宗与李训谋，屡欲废帝。”[⑥]可见宦官对天子的操控已到了“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⑦]的地步。一手遮天的宦官不仅决定皇位的继承人，更掌握皇帝的生死。“（元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是夕，上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享年四十三。时以暴崩，皆言内官陈弘志弑逆，史氏讳而不书。”[⑧]“……绛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为宦官所立。”[⑨]由于宦官对皇位的继承进行直接干预，把持着皇帝的废立之权，肆意改变先帝遗诏，选择符合自己意愿的傀儡皇帝，使得唐王朝的命运几乎全部掌握在宦官手里，严重威胁政局稳定。

宦官专权使内廷宦官集团与外廷官僚集团的斗争日趋激烈，加剧了唐王朝的社会矛盾。两个集团之间的博弈也成为皇帝制衡群臣、维持政局稳定的重要手段。宦官背后的支持者是最高统治者，这无疑助长了宦官的气焰，他们连皇帝都可以不放在眼里，对朝臣的有意攻击更是变本加厉。以元稹（779-831）为例，他谪居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涯便是宦官所致。《旧唐书·元稹传》记载了元和五年（810）元稹被贬江陵的始末：

“（稹）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

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597页。
②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63页。
③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61页。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597页。
⑤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881页。
⑥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866页。
⑦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54页。
⑧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2页。
⑨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597页。

走厅后。士元追之，后以箠击稹伤面。执政以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①]

《唐会要》卷六一记载：“旧例，御使到馆驿，已于上厅下了，有中使后到，即就别厅。如有中使先到上厅，御使亦就别厅。”[②]“旧例”表明，元稹根本无需为宦官让厅，却因此遭受宦官及其随从的侮辱，最终被宪宗以“年少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至江陵。由此可见宦官之气焰嚣张，而元稹被贬也足以说明皇帝对宦官的宠信。

中唐文人处在这样的政治夹缝中举步维艰，他们痛恨宦官的所作所为，在诗歌中揭露他们的恶劣行径。元稹在被贬江陵之后，依然写诗抨击宦官的所作所为，其《捉捕歌》：“捉捕复捉捕，莫捉狐与兔。狐兔藏窟穴，豺狼妨道路。道路非不妨，最忧蝼蚁聚。豺狼不陷阱，蝼蚁潜幽蠹……歌此劝主人，主人那不悟。不悟还更歌，谁能恐违忤。”[③]在揭露宦官恶劣行的同时，希求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但是收效甚微，接连遭到宦官的打击报复。在元稹进行政治活动的二十五年（含守母丧三年）间，他先后受到两个宦官当权集团一再的打击和诬陷，前后外贬长达二十年[④]。与盛唐的明君贤相相比，这样的朝政不能不让中唐文人感到失望。朝野之上政局混乱，朝廷之外藩镇割据，唐王朝的内忧外患使政权危机四伏。

二、藩镇割据

开元年间，玄宗采取多项举措维护国家的安定统一。设立藩镇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藩镇设立，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另一方面也是根据边疆形势的需要，它为开元年间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出自唐代西鄙人的《哥舒歌》曾唱道：“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这足以说明当时的藩镇对震慑外族、维护国家统一有着重要作用。至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当是玄宗始料未及的，更与他的初衷相悖。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的权力难以削弱，致使藩镇割据成为又一个威胁唐王朝统治的因素。杜甫所作《有感五首》其二，就直接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北方地区的割据形势：“幽蓟余蛇豕，乾坤尚虎狼”[⑤]。

安史之乱平定后的藩镇武装，主要有三种：一是河朔一带的安史旧部；二是

①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 4331 页。
② （宋）王溥撰：《唐会要》，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1062 页。
③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中册，第 698 页。
④ 吴伟斌：《元稹与宦官》，苏州大学学报，1986 年第 1 期，第 53-58 页。
⑤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3059 页。

中原一带的新设节度使；三是边缘地区的旧有藩镇[①]。这些藩镇表面上服从朝廷的统治，实际上却动乱频仍，加剧了唐王朝政局的的不稳定。藩镇对朝廷的威胁，有两种形式，一是反叛中央，二是内部动乱。据统计，大历至大和年间藩镇动乱约 130 起，几乎每一年都有藩镇动乱，一年之内少则一起，多则近十起。清人赵翼说："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逐帅杀帅，视为常事"。[②]这些动乱不仅造成藩镇内部的不安定，也使得藩镇统治范围内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唐王朝在一次次的动乱平定中亦是疲惫不堪。代宗在位期间曾采取措施限制藩镇的势力。如（大历）十二年五月，"……又令诸使非军事要急，无得擅召刺史及停其职务，差人权摄。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其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练'。"[③]朝廷试图通过限制节度使的职权、"定诸州兵"、不得私自召募兵士等手段来控制和削减地方兵力。德宗初年继续了代宗大历后期以来的削藩政策，制订两税法，从财力上对各藩镇进行限制。这些措施为宪宗后来强硬的削藩政策做了准备。尽管藩镇威胁着朝廷的统治，朝廷也不断遏制其势力发展，但藩镇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对维护唐王朝的稳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宋人尹源所言："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④]

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演愈烈，一些文人为了寻求个人出路不得不投靠藩镇。文人入幕或是为了实现自己救国济世的壮志，或为仕进，或为生计，总之，幕府为很多文人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云："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⑤]可见文人与幕府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据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诗人李益在十八年间曾五入幕府，先后依附的幕主为朔方节度使崔宁、幽州节度使朱滔、鄜坊节度使论惟明、邠宁节度使张献甫、幽州节度使刘济[⑥]。广为传唱的"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就是在崔宁幕所写。在刘济幕中，李益深受赏识，被辟为从事，后又提拔为营田副使。李益感激刘济的知遇之恩，写下："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⑦]之诗句，却因此在元和七年（812）受到皇帝"降居散秩"的处分[⑧]。韩愈在三次参加博学宏词考

①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21 页。
②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 391 页。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 年版，第 7245 页。
④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 年版，第 13082 页。
⑤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第 285 页。
⑥ 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现代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2 页。
⑦ 范之麟：《李益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版，第 71 页。
⑧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 5785 页。

试未果后，在贞元十二年（796）也不得不走幕府这条路，被宣武节度使董晋辟为观察推官，后又在徐州入张建封幕。但是从韩愈的诗文中可看出韩愈并不愿轻易入幕，他曾作《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以长者的身份劝导董邵南不要入幕："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①]入幕后，他对幕府的生活也并不是很满意，在张建封幕中虽然因私人关系得到很多照顾，但是韩愈始终感到郁郁不得志，在《与孟冬野书》中写道："默默在此，形意年矣，到今年秋，聊复辞去。"[②]元稹的仕宦生涯也与幕府有密切关系，从被贬为藩府幕僚到最后的武昌节度使，元稹对边将生活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在新乐府《西凉伎》中对边将生活的书写与他的藩镇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此外，藩镇生活使诗人接触实际的军营生活，对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有更深刻的体验，因此在书写盛唐的诗歌中一再劝诫君王戒边功，如元稹的《连昌宫词》结尾所言："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谋休用兵"。

三、政局混乱

对中唐文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中唐重大的政治事件。"贞元末至元和年间，出现了一种改革朝政、渴望中兴的思潮。在这样的背景上，出现了唐文学的第二次繁荣。"[③]中唐文人如刘禹锡、柳宗元等人早年热衷于政治，参与了唐顺宗时期旨在打击宦官，革除积弊的永贞革新。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政治运动中，力求改革弊政，救国救民，但是改革面临巨大的阻力，以失败而告终，他们被贬至偏远之地，不得量移。政治上的失意使他们将"'全盛之气，注射语言'，开始了抒愤文学的专力创作"。[④]他们在贬地的创作也成为贬谪文学的一大组成部分，其文学成就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环境所造就的。从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政治热情的衰退、对政局的失望，同时还有郁郁不得志的愤懑。

中唐社会的另一重大政治事件是牛李党争，它与与永贞革新密不可分，也是影响中唐文人生活境遇与心态的因素之一。孟二冬在《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中》称："关于唐代的党争……在时间问题上，规模较大，斗争激烈、影响深远的党争，是从安史之乱后开始出现的。"[⑤]随着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的加剧，中唐的社会政治越来越复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不断激化，使得朋党之争更加突出。针对如何对待藩镇的问题，中晚唐宦官与朝臣各分成两派，以吐突承璀为代表的宦

① 刘珍纶、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055页。
② 刘珍纶、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71页。
③ 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页。
④ 尚永亮：《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⑤ 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官一派主张用兵，与宰相李吉甫同，二者不免有所牵连。由此，朝野上下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宦官专权与朋党之争相互交织，使得中唐的政局更加混乱。

宪宗元和初年开始，宣宗即位后方止的牛李党争是唐代党争影响最大的案例。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就牛李党人在唐代政治史上之进退历程言之，两党虽具有悠久之历史社会背景，但其表面形式化则在宪宗之世。此后纷乱斗争，愈久愈烈。"[①]言及牛李党争对中晚唐文人的影响时，陈寅恪认为："夫两派既势不并立，自然各就其气类所近招求同党，于是两种不同社会阶级争取政治地位之竞争，遂因此表面形式化矣。及其后斗争之程度随时间之久长逐渐增剧，当日士大夫纵欲置身于局外之中立，亦几不可能。如牛党白居易之以消极被容（乐天幸生世较早耳，若升朝更晚，恐亦难幸免也），柳仲郢之以行谊见谅，可谓例外。其余之人若无固定显明之表示，如出入牛李未能始终属于一党之李商隐，则卒为两党所俱不收，而"名宦不造，坎壈终身"（《旧唐书》一九十下《文苑传下·李商隐传》语）。此点为研究唐代中晚之际士大夫身世之最要关键，甚不可忽略者也。"[②]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等皆受牛李党争牵连，傅璇琮指出："中晚唐大家，除了韩愈、柳宗元以外，其他如白居易、元稹、李绅、李商隐、杜牧，都与牛李党争有关。……如果脱离牛李党争的现实，元、白政治态度的变化也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③]

基于以上背景可知，安史之乱后中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各种社会弊端层出不穷，造成的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也影响着中唐文人的生存境遇。作为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士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以元、白为代表的中唐诗人尝试通过文学革新来补察时政。他们在作品中借古讽今，以盛唐人事喻今之人事，揭露社会弊端，以期统治者的觉醒。被大历诗歌颂和怀念的盛唐，在其后中唐诗人的笔下变成了讥刺、引以为戒的对象。时弊的亟待拯救，使他们以激愤又不失客观的笔触书写盛唐，反思历史。

第三节　人生遭际的影响

中唐诗人生活在安史之乱的阴影中，社会环境的变化，政治局势的混乱，使诗人的命运发生转折。个人遭遇的不幸对诗人的创作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就书写盛唐这一层面而言，中唐前期的诗人在此类诗歌中往往再现盛世繁华，时常流露出对盛唐的怀念和眷恋。他们对盛唐的追忆与安史之乱带给他们的沉痛记

①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8页。
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
③ 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忆有着直接关系。大乱不仅使他们的生存环境恶化，个人命运遭遇不幸，而且使他们的心灵受到重创，因此他们在诗歌中屡屡书写盛唐，渴望盛世的回归。之后的中唐诗人逐渐走出安史之乱的阴影，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清醒和深刻的认识，意识到中唐社会的种种问题，开始从盛唐衰颓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因此他们书写盛唐的诗歌中往往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历史见闻遥想盛唐，并对盛世或隐或现的弊端加以评判。

安史之乱使中唐诗人的生存更加艰难，对一些曾经在长安供职、交游或居住的中唐诗人而言，生活境遇的巨大变化使他们不得不承受这种剧变带来的苦痛。他们之中或是像韦应物，由上层社会直接沦落至远离统治中心的江南地区，或是如钱起，致力于结交达官显贵，以求仕途之平坦，或是如刘长卿，厌恶仕宦，向往隐逸。曾经经历过的盛世一夜之间恍如隔世，他们在诗歌中一边描写战争的惨烈，一边追忆着盛唐的人事，一边感慨自己的命途多舛，感伤与苦闷构成了他们诗歌的主旋律。安史战乱带给他们的独特体验渗透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使他们的创作再也没有了盛唐的积极向上、豪迈昂扬，一转而为低沉、苦闷。而像刘禹锡、元稹、白居易这些稍后时代的诗人不像大历诗人那样沉浸在痛苦的记忆中，他们希望辅佐君王，革新政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试考察以韦应物、刘禹锡（772-842）、白居易（772-846）为代表的中唐诗人的人生遭遇，可窥知个人命运也是他们书写盛唐的缘由之一。

韦应物出生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前后，他的家庭累世公卿，从十五岁开始，韦应物以门荫补玄宗侍卫。安史之乱爆发时韦应物还不到二十岁，因玄宗避蜀，他失去依靠，后至乾元中入太学读书。战乱使诗人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他不得不认清现实，另谋出路。对他而言，盛唐的辉煌被安史之乱彻底击垮，一切都恍如隔世："盛时忽去良可恨，一生坎壈何足云。"[①]年少时，作为玄宗的近身侍卫，他看到的是最高统治者的唯我独尊和盛世的辉煌。这时候的诗人意气风发、志得意满，甚至有些飞扬跋扈："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②]安史之乱后，他的从政生涯也充满波折，在仕与隐之间徘徊不定，先后经历了"出仕——闲居——再出仕——又闲居"的曲折过程。玄宗入蜀避难，诗人离开长安，寓居武功宝意寺；永泰元年（765）任洛阳丞，后被迫离职，居同德精舍；774年任京兆府功曹，后又居善福精舍。这一仕一隐间既有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又有对功名之心的渴求。虽然深知盛唐之世难以再现，但诗人内心还是有着对盛唐之世

①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74页。
②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页。

的怀念与留恋，在他的诗歌中这种感情随处可见，如《骊山行》中有对玄宗垂拱而治，开创盛世的回忆："君不见开元至化垂衣裳，厌坐明堂朝万方。访道灵山降圣祖，沐浴华池集百祥。千乘万骑被原野，云霞草木相辉光"[①]，《白沙亭逢吴叟歌》中是对昔日扈从游幸生活的追忆："亲观文物蒙雨露，见我昔年侍丹霄。冬狩春祠无一事，欢游洽宴多颁赐。尝陪夕月竹宫斋，每返温泉灞陵醉"[②]。

在中唐诸多诗人中，刘禹锡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置身于中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在顺宗即位后加入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集团，锐意革新，希望革除朝政弊端。然而由于宦官集团、藩镇势力、保守派官僚的阻挠，革新以失败而告终，参与永贞革新的文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置。刘禹锡初被贬为连州刺史，再贬为朗州司马，寓居朗州长达十年。元和十年（815）二月自朗州被召回，三月又被贬为播州刺史，刘禹锡请改为连州，又寓居连州六年。长庆元年（821）改授夔州刺史。长庆四年（824）转授和州刺史。直到大和二年（828）才重返京师。诗人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感慨："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③]。如此之长的贬谪生涯使诗人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这样的遭遇对他来说是不幸的，却使他的诗歌创作有了极大进展，让他在中唐韩孟、元白两大诗派之外熠熠生辉，赢得"诗豪"的美誉。他的诗歌中既有对自身命运和遭际的哀叹，又有来自逐臣的激越孤愤。这些内心深处的强烈情感在他遥想盛唐的诗歌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如果说刘禹锡在书写盛唐的诗歌中投射出更多的个人愤懑，那么白居易在感慨自身经历外则表现出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盛唐书写中投入更多的批判精神。褚斌杰先生《白居易评传》导言中说："白居易活动的时代，距离李白（公元七〇一——七六二）和杜甫（公元七一二——七七〇）虽然只有二、三十年的光景，但因为其中经过了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乱,社会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一向为人民歌颂的所谓'唐代盛世'，已经在十年的兵革摧残之下完全破灭了。继之而来的是灾荒、战乱、饥饿，是统治阶级更加残酷的掠夺。如果我们说李白和杜甫是安史之乱这场历史浩劫的预感者和经历者，而白居易则是这场浩劫后果的遭遇者了。"[④]他目睹中唐令人忧心忡忡的社会现实，在任左拾遗期间敢于直言进谏，并创作大量现实主义诗歌，同元稹一起倡导新乐府运动。在新乐府中，诗人借咏盛唐之世讽谏君王，从不同层面指出中唐的社会问题。他前期的兼济天下是由其政治家和

①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80 页。
②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74 页。
③ 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047 页。
④ 褚斌杰：《白居易评传》，作家出版社，1957 年版，第 1 页。

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决定的，在其位则谋其职，白居易一直践行着自己的政治理想。

总之，时代精神对个体生命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时代首先造就文人，文人继而创作出带有时代烙印和个人印记的文学作品。中唐诗人之所以书写盛唐，既有时代因素的影响，又与诗人自身经历密切相关。盛世之繁华带给中唐诗人无限的想象和期待，中唐的社会现实又使有识之士不能不肩负起革除时弊的重任，加上诗人自身独特的生活经历，都使得书写盛唐成为可能。

第二章　以怀念为主的盛世再现

中唐诗人书写盛唐，或是追忆，或是遥想，他们都曾试图还原盛世之景，在诗歌中再现盛世辉煌。无论是凭借真实记忆还是历史想象，他们抚今追昔的情思中都不能不涉及到盛唐的故事、故地、故人。

第一节　盛唐盛事之书写

盛事，谓之大事、美事。中唐诗歌中的盛唐盛事书写多涉及千秋节、玄宗游幸华清宫和皇帝赐宴这三者。

一、千秋节

千秋节是唐玄宗时期设立的节日。宋人洪迈曰："诞节之制，起于明皇，令下宴集休假三日，肃宗亦然。"[①]玄宗的诞辰是八月五日，开元十七年（729）八月，在宰相张说等人的建议下，唐玄宗将每年的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昭告天下，普天同庆。关于此事，史书有明确记载：

> 《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百僚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已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仍编为令，从之。"[②]
>
> 《资治通鉴》云："(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楼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说帅百官上表，请以每岁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布于天下，咸令宴乐。寻又移社就千秋节。"[③]

玄宗在当时励精图治，深得民心。作为一代明君，他的诞辰作为节日来庆祝，并不为过。张说代表其他文武百官在奏表中言明玄宗的诞生非比寻常：

> 臣闻圣人出则日月记其初，王泽深则风俗传其后。……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气含神，九龙浴圣，……月惟仲秋，日在端午，恒星不见之夜，祥光照星之期，群臣相贺曰："诞圣之辰也，焉可不以为嘉节乎？比夫曲水禊亭、重阳射圃、五日彩线、七夕粉筵，岂同年而语也？"[④]

这段话足以证明玄宗在群臣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明君形象，他们认为玄宗的

① 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8，79页。
②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3页。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786页。
④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3卷，第2252页。

诞辰理应大加庆贺，这与其他的传统节日、习俗是不能同年而较的。中唐诗人顾况在《八月五日歌》中也将玄宗的降生赋予宗教色彩："四月八日明星出，摩耶夫人降前佛。八月五日佳气新，昭成太后生圣人。"[①]他追忆昭成太后生下玄宗之事，将玄宗的诞生与释迦牟尼的诞生相提并论，内心之庆贺溢于言表。诗人接下来概括了千秋节的来历："开元九年燕公说，奉诏听置千秋节。"顾况亲历盛唐，在千秋节这样一个举国欢庆的盛大节日里，他极有可能目睹了这一盛况，且看诗歌所言："丹青庙里贮姚宋，花萼楼中宴岐薛。清乐灵香几处闻，鸾歌凤吹动祥云。已于武库见灵鸟，仍向晋山逢老君。率土普天无不乐，河清海晏穷寥廓。梨园弟子传法曲，张果先生进仙药。"[②]

诗歌中的丹青庙即凌烟阁，悬挂太宗以来功臣之像。花萼楼乃玄宗开元初建，楼名来自于《诗经》"棠棣之花"的含义，寓意兄弟诸王和睦。节日里当然离不开歌舞助兴，轻歌曼舞，君臣同乐。这都是盛唐治世之景的最好诠释。中唐诗人戎昱（约740-约800）在《八月十五日》中也不禁感慨："忆昔千秋节，欢娱万国同。"[③]

千秋节作为盛唐的重大节日，在王建（约766-约832）的诗中也有呈现："天宝年前勤政楼，每年三日作千秋。飞龙老马曾教舞，闻著音声总举头。"[④]王建诗歌中呈现的是勤政楼前举行盛会的场景，百官来朝，并伴有大型歌舞、杂技、舞马等表演。诗歌中的"飞龙"即是指舞马表演。《新唐书·礼乐志十二》载："玄宗又尝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倾杯》数十曲，壮士举榻，马不动。乐工少年姿秀者十数人，衣黄衫，文玉带，立左右。每千秋节，舞于勤政楼下。"[⑤]王建并未亲历盛唐，但是诗歌中所描绘的盛大场面却是真实存在的。史书中不乏这样的盛事记载，因此王建能"遥想"出如此的盛唐，也是情理之中。

关于千秋节的盛况，亦可在盛唐之人的作品中得到证实。张说在上表玄宗的时候，就曾对千秋节如何度过做了设想：

> 臣等不胜大愿，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乐，休假三日。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作寿酒宴会，名为赛白帝、报田神，上明元天，光启大圣，下彰皇化，垂裕无穷，异域占风，同见美俗。[⑥]

千秋节举国欢庆，休假三日。群臣要向帝王进献甘露醇娘、金镜绶带；士族

① 王启兴、张虹注：《顾况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
② 王启兴、张虹注：《顾况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
③ 臧维熙注：《戎昱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④ 王宗堂校注：《王建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46页。
⑤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册，第22卷，第477页。
⑥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3卷，第2252页。

和庶民则是以丝带香囊等作为礼物相互赠送；村社同样要举行各种欢庆活动以彰显河清海晏之图景。上至帝王，下至平民，都洋溢着节日的喜庆，好一派祥和又欢娱的场景！

除了千秋节这样盛大的节日，玄宗与杨贵妃游幸华清宫也同样是盛事一件。

二、玄宗游幸华清宫

提到盛唐，就不能不提到华清宫，它是后世诗人作品中的“常客”，不仅因为它与李杨爱情故事有关，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更因为它见证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

华清宫古已有之，在唐代先后扩建，初名汤泉宫，于贞观十八年（644）建于临潼县东南骊山上。咸亨三年（672），更名温泉宫。“至天宝六载（747），十月三日，改温泉宫为华清宫。”[①]盛唐时期，华清宫的规模和气势达到顶峰，玄宗在此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娱乐等活动，华清宫成为除长安都城之外玄宗的另一个常居之地。玄宗执政时期，每年十月都要游幸此地，一直到岁末始还长安。陈鸿的《长恨歌传》称：“时每岁十月，（明皇）幸驾华清宫。”[②]《旧唐书》记载，“玄宗每年冬十月幸华清宫，常经冬还宫”[③]。据统计，唐玄宗在位四十五年，行幸华清宫多达四十余次，尤其在天宝年间，这里实际上成了另一政治、娱乐中心。[④]

除了游幸次数多之外，玄宗出行的阵势也是相当铺排。大历诗人韦应物当年作为玄宗的御前侍卫，常伴君王左右，玄宗游幸华清宫时的场景如在目前：

身骑厩马引天仗，直入华清列御前。玉林瑶雪满寒山，上升玄阁游绛烟。平明羽卫朝万国，车马合沓溢四鄽。[⑤]

诗人在诗中写到每次扈从游幸，身骑御厩之马，威风凛凛地率领仪仗队拥卫君王。山路之上，寒雪压枝，绛烟缭绕，宛如仙境。次日平明，万国来朝，车马喧嚣。这样的场景恐怕只有亲历之人才能描绘出来，韦应物《骊山行》中的诗句同样描写了游幸时的浩荡声势：“羽旗旄节憩瑶台，清丝妙管从空来。万井九衢皆仰望，彩云白鹤方徘徊。”[⑥]旌旗招展，仙乐飘飘，万人瞩目，每一次的出行都是一次盛会，彰显着盛世之恢宏。再看元稹的《连昌宫词》：“平明大驾发行宫，

① 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559页。
②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656页。
③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99页。
④ 王玄玉：《唐玄宗与华清宫》，《乾陵文化研究》，2006年第00期，第95-99页。
⑤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
⑥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80页。

万人歌舞涂路中。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①]尽管元稹并未亲历盛唐，他的想象与杜甫《丽人行》中的“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②]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唐诗人王建在《温泉宫行》的前半部分中再现了玄宗游幸华清宫时的盛况：“十月一日天子来，青绳御路无尘埃。宫前内里汤各别，每个白玉芙蓉开。朝元阁向山上起，城绕青山龙暖水。夜开金殿看星河，宫女知更月明里。”[③]诗歌第一句首先点明了玄宗游幸温泉宫的时间，接着写御驾从长安到骊山的路上都用青绳隔开，以示警戒。除此之外，所经之路必须要一尘不染，以待圣驾。这幅画面充分显示了玄宗当时出行的声势之浩大，场面之壮观。不光如此，沐浴的汤水还有宫前内里（当时称宫内为内里）之分，每一个汤池都是用雕刻着莲花图案的白玉石砌成的。盛唐皇室之奢华可见一斑！华清宫周围青山环绕，温泉水汩汩而出。夜半时分，玄宗与贵妃在殿内共赏星河……玄宗游幸华清宫的场面，在中唐诗人的笔下是浩浩荡荡、波澜壮阔、奢华无比的，这充分显示出盛世之雄风。

三、皇帝赐宴

皇帝赐宴对中唐诗人来说也是盛事一件。贞元四年（788）重阳日，德宗赐百僚宴于曲江亭。[④]韦应物当时在长安左司部中任，应制和德宗重阳诗，作《奉和圣制重阳日赐宴》。作为经历过盛世繁华的诗人韦应物，在写这首应制诗的时候，不由得回想起开元盛世。

> 圣心忧万国，端居在穆清。玄功致海晏，锡宴表文明。恩属重阳节，雨应此时晴。寒菊生池苑，高树出宫城。捧藻千官处，垂戒百王程。复睹开元日，臣愚献颂声。[⑤]

诗人在诗中不可避免地要对德宗朝盛赞一番，称德宗心系天下，在他的统治下河清海晏，可以为后世帝王提供法式。结尾处“复睹开元日，臣愚献颂声”，国泰民安的景象让诗人好像回到了开元盛世……虽是对德宗歌功颂德，但从中可间接读出开元年间赐宴群臣的盛况。玄宗朝，赐宴群臣还伴有形式多样的活动，如乐舞、赋诗、竞技类等，史载：

> 初，上皇（玄宗）每酺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于杂戏；又以山车、陆船载乐往来；又出宫人舞霓裳羽衣；

①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中册，第704页。
②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2页。
③ 王宗堂校注：《王建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④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6页。
⑤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

又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又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①]

君臣宴饮赋诗的传统来源于汉武帝在柏梁台上与群臣和诗的美事，是治世的表现。玄宗有感于此，在《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诗序中写到“岂独汉武之殿，盛朝士之连章，魏文之台，壮辞人之并作云尔？”[②]宴饮赋诗的传统因此又延续下来，群臣借应和赋诗之机对赞美盛唐雄风。

韦应物由德宗朝的相似情景联想到玄宗朝赐宴群臣的欢娱场面，流露出一种对盛世的怀念之情。他经历过盛世的繁华，又痛惜繁华逝去，眼前的相似场面不能不使他“复睹开元日”，这里对盛世的怀念中恐怕又含有对现实的不满。安史之乱后的中唐社会即使再太平安定，也没有记忆中的盛世那般辉煌，可诗人又不得不称颂这样的太平。矛盾复杂的心情相互交织，盛唐记忆更是增添了诗人的无限感慨。

第二节　盛唐故地之书写

中唐诗歌中的故地书写涉及最多的当属两京行宫及当年风流人物的居所，其中宫殿书写多以华清宫为吟咏对象，部分诗歌涉及东都洛阳的宫殿。这些故地书写在再现盛世繁华的同时寄托了诗人对历史兴衰交替的感慨。

一、两京行宫之书写

中唐诗人在书写盛唐宫殿时，既书写了前文所提到的玄宗游幸华清宫时的盛大场面，也书写了华清宫当年的繁盛。从华清宫的地理位置、周围环境到玄宗赋予它的神圣地位，都成为中唐诗人书写的对象。如张继的《华清宫》：“天宝承平奈乐何，华清宫殿郁嵯峨。朝元阁峻临秦岭，羯鼓楼高俯渭河。玉树长飘云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③]诗歌描述了天宝年间华清宫的雄伟壮观和歌舞升平。诗中的朝元阁建于唐初，因唐室与道教创始人老子同姓，故追封老子为“太圣祖玄元皇帝，后修建了道教场所朝元阁。玄宗天宝年间曾梦见老子降临朝元阁，故改名为降圣观。王溥的《唐会要》有记载：“（天宝）七载十二月二日，玄元皇帝降于朝元阁，改为降圣阁。”[④]据《长安志》卷十五记载：“羯鼓楼在朝元阁之东，近南缭墙之外。”[⑤]诗人在写华清宫周围众多建筑的同时，借朝元阁从侧面反映出玄宗对道教的推崇。此外仙乐飘飘、霓裳舞起，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这都是诗

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993页。
②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8页。
③ 周义敢：《张继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④ 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559页。
⑤ 辛德勇、郎洁点校，宋敏求：《长安志》，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457页。

人对盛唐时期华清宫的想象。再如卢纶的《华清宫》："汉家天子好经过，白日青山宫殿多"[①]言明华清宫是玄宗常幸之地，当时宫殿颇多，一片繁盛。

中唐诗人在写华清宫的同时也对盛唐的其他宫殿作了描述。如王建的《行宫词》："上阳宫到蓬莱殿，行宫岩岩遥相见。向前天子行幸多，马蹄车辙山川遍。当时州县每年修，皆留内人看玉案……"[②]这里的行宫是东都洛阳的上阳宫，蓬莱殿位于西京长安。昔日的东都是皇帝多次驾临的地方，《唐会要》卷二七《行幸》篇记载：

开元五年正月十日，幸东都。

十一年正月二日。发东都。北巡。

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幸东都。

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发东都。赴东岱。

二十年十月十二日。自东都，幸太原。[③]

从历史记载中就可看出东都洛阳也是相当"受宠"的，难怪诗人写："向前天子行幸多，马蹄车辙山川遍。"

同诗人王建类似，元稹作为未曾经历盛唐之世的诗人，也凭借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历史传闻再现了唐代行宫之一——连昌宫。《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二》载："寿安（故址在今河南宜阳）……西二十九里有连昌宫，显庆三年置。"[④]诗人借住在连昌宫旁的老人之口，描绘连昌宫当年的繁盛："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阑干立。楼上楼前尽珠翠，炫转荧煌照天地。归来如梦复如痴，何暇备言宫里事。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燃烛。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⑤]诗人从李杨二人写起，写到宫室的富丽堂皇，歌舞升平和节日氛围。在这里写连昌宫昔日的兴盛并不仅仅是为了再现盛世繁华，吟咏历史一定有诗人的深刻用意。为达到劝诫的目的，诗人接下来写安史之乱造成的破坏，以今昔对比的方式引起统治者的注意。

长安的华清宫、洛阳的上阳宫等都曾是玄宗的常幸之地，它们见证了盛世繁华。在盛世故地中，除了天子临幸之地是诗人们的吟咏对象，那些王公贵族曾经的"豪宅"也时常出现在中唐诗人的笔下，它们的兴废变迁也与盛唐荣辱与共。

---

① 刘初棠校注：《卢纶诗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08页。
② 王宗堂校注：《王建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③ 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519-521页。
④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83页。
⑤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中册，第704页。

二、盛唐寺观之书写

没有亲眼目睹盛唐之世的诗人遥想盛唐往往是某时某地的场景触发了他们的情思，激发他们想象故人、故地当年是以怎样的面貌呈现于盛世的，所以在行经历史遗迹之时，他们往往涌现出丰富的情感。

王建的《题应圣观》："精思堂上画三身，回作仙宫度美人。赐额御书金字贵，行香天乐羽衣新……"[①]应圣观即李林甫旧宅。《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玄宗天宝九载记载："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上悦。"[②]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平康坊："嘉猷观，明皇御书金字额以赐之。林甫奏女为观主。观中有精思院，王维、郑虔、吴道子皆有画壁。林甫死后改为道士观，择道士者居之。"[③]故云"精思堂上画三身"，诗歌后两句描写了观中壁画，再现了当年玄宗御赐金字的场景。

再看他的《题石瓮寺》：

青崖白石夹城东，泉脉钟声内里通。地压龙蛇山色别，屋连宫殿匠名同。檐灯经夏纱笼黑，溪叶先秋腊树红。天子亲题诗总在，画扉长锁碧瓮中。[④]

诗题中的石瓮寺，据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五载："福严寺，《两京里道记》曰：在（临潼）县东五里南山半腹，临石瓮谷，有悬泉激石成臼似瓮形，因以谷名名为石瓮寺。"[⑤]金圣叹评此诗："虽曰寄题佛寺，而实怀念先皇，所谓触事生悲，借壁弹泪者也。"[⑥]《旧唐书·玄宗纪上》记载："开元二十年六月，遣范安及于长安，广花萼楼，筑夹城，至芙蓉苑。"[⑦]《长安志》："开元二十年，筑夹城，入芙蓉园，自大明宫夹罗城复道，经通化门，以达此宫，次经明春延喜门，至曲江芙蓉园，而外人不之知也。[⑧]由此可知，石瓮寺近于夹城，诗人有感于此，联想至玄宗，况且寺中玄宗亲题御笔赫然在目，诗人怎能不念及盛世！

中唐诗人书写盛唐时期的宫殿、旧宅、寺院、道观等，多是由眼前之景触发情思。曾经的盛唐之繁盛，在今日已不复存在，这些昔日之景带给诗人的实则是无尽的悲戚。

此外还应注意到，无论是韦应物笔下玄宗行幸华清宫的真实场景，还是元稹《连昌宫词》中借老人之言亦真亦假的叙述，中唐诗人在书写盛唐盛事、故地的

---

① 王宗堂校注：《王建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07页。
②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900页。
③ 辛德勇、郎洁点校，宋敏求：《长安志》，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8页。
④ 王宗堂校注：《王建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⑤ 辛德勇、郎洁点校，宋敏求：《长安志》，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0页。
⑥ 王宗堂校注：《王建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⑦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册，198页。
⑧ 辛德勇、郎洁点校，宋敏求：《长安志》，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6页。

时候，对李杨二人都有涉及。分析这些诗歌会发现大致可分为两种意图，其一是将他们看作盛世风貌的代表人物，着眼于对他们奢华生活的描写；其二是对二人情感的主观评价，既有同情又有讽刺。

关于第一点，中唐诗人多以《霓裳羽衣舞》为切入点引出二人，可以说，只要有“仙乐”、“霓裳”，诗意隐含的必是李杨二人纵享歌舞之乐。如张继的“玉树长飘云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①]、王建的“有时云外闻天乐，知是先皇沐浴来”[②]。这些诗句并未将盛唐的衰颓与唐玄宗的耽于享乐联系在一起，也没有归罪于杨贵妃的女色祸国，只是流露出诗人对盛世不再的哀叹和惋惜。

意图之二，对李杨二人的批判或是同情，皆是诗人有感于盛世不再，反思历史的表现。对李杨二人的评判，仁者见仁，即使是同一诗人，在不同的诗歌中态度也可能不同。如李益在《过马嵬》一诗中表现出对杨贵妃的同情：“汉将如云不直言，寇来翻罪绮罗恩。托君休洗莲花血，留记千年妾泪痕”[③]，而《过马嵬二首》其一中“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④]又是对二人的批判。元稹在诗歌中认为杨贵妃仗着玄宗的偏爱，有恃无恐，养虎为患，使得安禄山、杨国忠这些佞臣贼子有机可乘，祸国殃民。元稹的挚友白居易创作长篇巨制《长恨歌》书写二人之事，虽然关于《长恨歌》主题的研究论著已不胜枚举，但是其中流露出的遗憾、同情是不可否认的，否则白居易也不会将其归入“感伤诗”一类。

中唐诗人对李杨故事的书写为后世提供了创作源泉，使杨贵妃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中，促进“杨贵妃”这一文学母题的形成与嬗变。这在最后一章另有论述。

第三节　盛世再现中的悲戚

盛唐之故事、故地的兴废，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唐王朝的兴衰变化。这种兴衰交替的历史规律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依然能够触发诗人内心的悲戚。

一、盛世不再的哀伤

盛世不再的哀伤，在中唐诗人韦应物的诗歌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作为玄宗曾经的御前侍卫，韦应物亲历盛唐的一切繁盛，又目睹这一切化为乌有，这样的打击对诗人来说无疑是异常沉重的。所以盛唐的故人、故事一旦触碰诗人的内心，

① 周义敢：《张继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② 王宗堂校注：《王建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02页。
③ 范之麟：《李益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④ 范之麟：《李益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7页。

关于盛唐的记忆便会喷涌而至，一发不可收拾。这种哀伤遍布韦应物有关盛唐的诗歌中。

《唐才子传》对韦应物前半生的介绍相当简洁："韦应物，京兆人也。尚侠，初以三卫郎侍玄宗；及崩，始悔，折节读书。"[①]建中三年（782），诗人出守滁州时作《逢杨开府》：

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茕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坐客何由识，惟有故人知。"[②]

杨开府应是诗人为三卫郎时的共事者，即为诗人故交。盛唐的一切都不复存在，诗人将有关盛唐的记忆埋藏在心底，何曾想在此地遇到故人，往事历历在目，诗人不由得便与杨开府话旧。年少时仗着御前侍卫的身份，恃宠而骄，蛮横霸道，连司隶也不敢招惹。沉浸在安逸的生活中不知乱之将至，安史乱起，昔日的"霸王"也沦落到"憔悴被人欺"的地步！这对曾经心高气傲的诗人是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折节读书，再入仕途，总有不如意之事……所识之人，又有几人能懂？唯有与故人论旧才能获得些许安慰。《广德中洛阳作》中，诗人在洛阳目睹战后一片萧条的景象，不由得追忆起当年开元之太平盛世："生长太平日，不知太平欢。今还洛阳中，感此方苦酸。"[③]回忆往昔，诗人有一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悔恨，又有今非昔比的心酸和无奈。

顾况的《八月五日歌》用大半的篇幅回忆千秋节的盛况，可是结尾却似哀乐："玉座凄凉游帝京，悲翁回首望承明。云韶九奏杳然远，唯有五陵松柏声。"[④]举国欢庆的时刻早已一去不返，诗人追忆至此，情绪直转悲凉。《听刘安唱歌》一诗中，"子夜新声何处传，悲翁更忆太平年。即今法曲无人唱，已逐霓裳飞上天。"[⑤]诗人听乐工刘安唱《子夜歌》，不由得追忆起开元天宝的太平盛世，感慨安史之乱之后，法曲这样的歌舞大曲都无人歌唱，包括《霓裳羽衣曲》在内的盛唐曲子也都无人传唱。盛世之音乐勾起诗人内心的盛世记忆，抚今追昔，世事如梦，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已。

还应注意到韦应物的《骊山行》中，在回忆了玄宗朝明君贤臣的治世之后，诗人笔锋一转，落到安史之乱带来的灾难上："干戈一起文武乖，欢娱已极人事

①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3页
②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页。
③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④ 王启兴、张虹注：《顾况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
⑤ 王启兴、张虹注：《顾况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页。

变。圣皇弓剑坠幽泉，古木苍山闭宫殿。”[①]干戈起、人事变、圣皇不再、人去楼空……诗人曾经亲历的盛唐就这样不复存在，这怎能不让他感到忧伤！怀念、忧伤之外，亦有反思。玄宗信奉道教，追求“无为而治”，天下之事，英豪共理，这样的垂拱而治的确是治世的一种表现，但是在他统治后期，由崇尚道教的“清静无为”逐渐转化为对朝政的懈怠，将军国大事交由李林甫等人处理，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受道教思想的影响，玄宗晚年到处寻仙访道，追求长生不老，诗歌中的“访道灵山降圣祖”、“登山朝礼玄元室”、“乃言圣祖奉丹经，以年为日亿万龄”、“三清小鸟传仙语，九华真人奉琼浆”[②]等诗句是玄宗对道教之虔诚的表现。这种做法对盛唐的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韦应物在诗歌中描写玄宗崇尚道教的种种铺排场面，隐含着对玄宗晚年沉迷道教，不问政事的批判。

二、故交零落的孤独

“他乡遇故知”乃人生四喜之一，古往今来，友情都是人们在孤寂落寞时的安慰。对于远离京都，流落他乡的诗人来说，能与一二故交喜相逢，实为莫大的安慰。杜甫在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与少年知交偶遇，悲喜交集，问及故人，多已不在人世，哀叹道“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③]。在经历了人生的颠沛流离、大起大落之后，对故乡、故人都难免生出更为浓厚的怀念之情。杜甫说“交情老更亲”[④]，韩愈说“少年乐相知，衰暮思故友”[⑤]都是对这种感情的直接表达。这些故交，可以是曾经共事过的人，也可以是曾经提拔过自己的人，身处特定的环境中都可能引发诗人对他们的怀念，生出一种“昔年亲友半凋零”的孤独之感。

韦应物在《话旧》一诗中写道：“存亡三十载，事过悉成空。不惜沾衣泪，并话一宵中。”题下自注：“亭中对兄姊话兰陵、崇贤、怀真以来故事，泫然而作。”[⑥]兰陵、崇贤、怀真均为长安城中坊里名，往事已过去三十年，诗人和亲人说起这几十年的物是人非，有道不尽的沧桑之感。大历四年（769）诗人自京洛赴扬州途中与李录事相逢，不禁悲喜交加：“此日相逢思旧日，一杯成喜亦成悲”[⑦]。李录事曾与诗人同为三卫郎，宿卫宫中。看到故人即回忆起当年护驾出行，春游曲江，东幸骊山时的旧事，如今却是“近臣零落今犹在，仙驾飘飖不可期”[⑧]。

故交零落对诗人来说不仅仅意味着感情上的孤独，更增添了他们对现实的失

①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80 页。
②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80 页。
③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324 页。
④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2025 页。
⑤ （清）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 年版，下册，第 620 页。
⑥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14 页。
⑦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6 页。
⑧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6 页。

望。故交健在，那么诗人就有可以谈古论今、饮酒赋诗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故交也是“伯乐”。他们与诗人心灵相通，对诗人的才情、境遇有着与旁人不一样的深入了解。如若失去了这些志同道合的故交，试问谁人能懂己心？没有了这些人的欣赏与支持，在岁月蹉跎中孤军奋战，对谁人来说都是失落的。也难怪杜甫会感慨“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韦应物在与杨开府相逢时也是潸然泪下：“坐客何由识，惟有故人知”[①]。

三、时移世易的无奈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②]，曹操当年壮怀激烈，没有丝毫的英雄迟暮之感。然而中唐诗人在经历安史之乱战火的“洗礼”之后，心中的理想之火也被浇灭，时常流露出一种老之将至、人生已成定局的衰败感。面对亘古不变的时移世易，他们显出一种无奈和消沉。这种无奈中，既有垂垂老矣，鬓发如霜的唏嘘，又有命途多舛，功业未建的失意。

中唐诗人在诗歌中用大量篇幅再现盛唐繁华的同时，总是会联系自己的人生经历，对生命加以总结。如韦应物的“归来视宝剑，功名岂一朝”[③]、“时役使人老，吾年白犹少”[④]、“出身天宝今年几，顽钝如锤命如纸。作官不了却来归，还是杜陵一男子”[⑤]。一切繁华都如过眼云烟，盛世曾让诗人意气风发，可烟消云散之后，它带给诗人的只能是无尽的伤感。

诗人以亲历者的心态追想盛唐，盛唐的一切让人艳羡和怀念，可是即使是这样的辉煌也一样会消逝，更何况自己这样的眇眇之身。面对生命的日渐终结，他们无能为力。人生理想难以实现，“自叹犹为折腰吏”[⑥]，感慨“可怜同宦者，应悟下流难”[⑦]、“非才果不容……憔悴被人欺”[⑧]，在昨日繁盛与今日之景况的对比中，他们以失败者的角度审视自己，产生巨大的落差感。

①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页。
② 夏传才：《曹操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③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1页。
④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
⑤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
⑥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⑦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⑧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8页。

第三章　以批判为主的盛世书写——以元、白为代表

中唐诗人在吟咏盛唐时，怀着复杂的感情，既有大历诗人的怀旧，又有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的批判讽刺。前者侧重于再现盛世繁华，后者则着眼于现实，直面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端，借古讽今，以求唤醒当朝统治者。所以从这一层面来说，书写盛唐不仅包括河清海晏、物阜民丰的盛唐，也应该有太平盛景背后的“不堪”，比如战争影响下的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比如统治者的安于享乐，不思进取。要借古讽今，针砭时弊，就不能不立足于该时代的政治，借古代的政事来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因此中唐诗人吟咏盛唐的诗歌中不乏对盛唐战事的述评，对玄宗声色误国的批判，兼诗人对“胡风”问题的思考。这些诗歌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中唐诗人的政治观和历史观，是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

第一节　中唐诗歌中的盛唐战事书写

开元天宝年间整体上虽是太平盛世，但是统治者为了扩大疆域，巩固统治，还是会发起大大小小的战争。战争需要兵源，政府到处强行征兵，造成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长期的战争又使得田园荒芜，百姓衣食匮乏，流离失所。大诗人杜甫就曾在《兵车行》中对玄宗即位以来频繁的战事进行了批判：“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①]这首诗歌反映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苦难，不仅使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而且劳动力大量丧失，良田废弃，荆棘丛生，严重破坏生产，重男轻女的社会观念也因此改变，……这一切都是玄宗的穷兵黩武造成的，诗歌表达了诗人对统治者发动战争的强烈谴责。

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歌中也有涉及盛唐战事，表明反战思想的。他在新乐府《新丰折臂翁》更直接地反映了战争带给百姓的深重灾难，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这首诗歌是借玄宗天宝年间一位新丰老人的亲身经历，警示君王切莫肆意用兵：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

①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9页。

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①]

这首诗歌和杜甫的《兵车行》批判的都是玄宗天宝年间对南诏发起的非正义战争。白居易还在诗歌《蛮子朝》中对这场战争的惨烈作了描述："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②]战兵连祸结使得尸横遍野，百姓苦不堪言。《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载："（天宝十载）夏，四月，壬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旧制，百姓有勋者免征役，时调兵既多，国忠奏先取高勋。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③]

白居易在诗歌题下序"戒边功也"，意在劝诫当今统治者不要穷兵黩武。老人自述生逢太平盛世，本不识兵器，奈何天宝年间遭遇强行征兵，而且要去偏远的云南。那样的瘴疠之地，士兵未到十之二三就已经死去。老人当年二十四，也在征兵之列，为了免被征兵留得性命，他在深夜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偷将大石捶折臂"。六十多年过去了，折臂也还是夜夜疼痛，但是老人庆幸自己保住了这条性命……这一番话，让诗人唏嘘不已。统治者的一条诏令会影响黎民百姓的一生，他们情愿自残手足，也不想应征入伍，因为那根本就是一条不归路，有去无回啊！诗人在最后"卒章显其志"，劝诫统治者以史为鉴，切忌穷兵黩武，使民怨沸腾，生灵涂炭。

杜甫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朝统治者，与杜甫不同的是，中唐诗人多借古讽今，借盛唐的战事来提醒统治者穷兵黩武只会动摇国基，失去民心，前文所提到的元稹的《连昌宫词》即是如此。除了描写连昌宫往日的兴盛，诗歌还将其与安史之乱后的荒废进行对比，以达到劝诫统治者的目的。我们看诗人笔下连昌宫的现状：

①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册，第165页。
②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册，第190页。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907页。

“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闭树宛然……荆榛栉比塞池塘，狐兔骄痴缘树木。舞榭欹倾基尚在，文窗窈窕纱犹绿。尘埋粉壁旧花钿，乌啄风筝碎珠玉……自从此后还闭门，夜夜狐狸上门屋。”[①]诗人用大量篇幅来写安史之乱前后连昌宫的景象，说明战乱造成的破坏之大和百姓所遭受的心理冲击。最后借老人之口来表明自己的意图：“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谋休用兵。”[②]

据吴伟斌考证，这首诗歌是元稹作于元和十三年（818）四月，此时诗人任通州司马。诗中提到的“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痏”，即指“安史之乱”平定五十年后的元和（806-815）晚期。“今皇神圣丞相明，诏书才下吴蜀平。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四句，指的是元和元年（806）九月唐宪宗平定蜀地刘闢的叛乱和元和二年（807）十月平息浙西李錡的叛乱以及元和十二年（817）十月平定吴元济的叛乱，诗中的“今皇”就是唐宪宗，因此《连昌宫词》是元稹追忆往日“经过行宫感时抚事之作。[③]诗人此时被贬通州，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结合自己仕宦生涯的宫廷生活经历和民间传闻写下这首长篇叙事诗。在诗歌中诗人借老人之言分析了盛唐由盛转衰的根源，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批判奸相杨国忠和李林甫，揭露玄宗朝骄奢淫逸的生活和对杨氏家族飞扬跋扈的无视纵容，反映外戚专权对朝廷的危害，目的都是希望当朝统治者引以为戒。他希望有姚宋这样的贤相为朝廷谋福祉，劝诫统治者“努力庙谋休用兵”。这是诗人的政治理想，也是黎民百姓所心心念念的。

洪迈的《容斋随笔》将元稹的《连昌宫词》和白居易的《长恨歌》加以比较，所论如下：

> 元微之、白乐天，在唐元和、长庆间齐名，其赋咏天宝时事，《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宫词》有监戒规讽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五十年来作疮痏”。其末章，及官军讨淮西“乞庙谋”、“休用兵”之语，盖元和十一二年间所作，殊得风人之旨，非《长恨》比云。[④]

依洪迈所言，元稹的《连昌宫词》在规劝统治者这一层面上较白居易的《长恨歌》有过之而无不及。然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本意概与元稹的“规劝”意

①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中册，第704页。
②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中册，第704页。
③ 吴伟斌：《元稹〈连昌宫词〉新解》，《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第55-64页。
④ （宋）洪迈撰：《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0页。

图有所不同，此处不加详论。

中唐诗人批判盛唐战事的诗歌不在少数，以白居易和元稹二人的的这两首新乐府为代表，他们的诗歌中都揭露了战火连天带给百姓的深重灾难，对战争进行强烈谴责，表达了绝对的反战思想，也借盛唐之战事给统治者以警示。如果统治者在赞赏诗人的诗才之余能够欣然纳谏，也就不枉诗人此番“长篇大论”了。

第二节　中唐诗歌中的盛唐之胡舞与胡乐

唐代社会多元、包容、开放，使得多种外来文化进入之后获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如传入中原的西域舞蹈《胡旋舞》、印度剧目《西凉伎》、用西域华原石制作的乐器华原磬等都受到唐人的喜爱，盛唐尤甚。唐玄宗是一个爱好乐舞的皇帝，杨贵妃善舞自不待言，安禄山虽然生得虎背熊腰，却也能用胡舞来魅惑圣心。因此中唐诗人在言及盛唐衰颓的原因时，往往将三人与胡乐、胡舞联系起来，批判玄宗沉溺于胡乐、胡舞，不问政治的昏聩行为，其中以元稹、白居易二人在新乐府中的批判最具代表性。

在当时，胡舞中最为风靡的当属胡旋舞。《旧唐书·音乐志》载：“康国乐，……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①]白居易《胡旋女》题下注 “天宝末，康居国献之。”[②]元稹《胡旋女》首句：“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③]由此知胡旋舞是西域少数民族进献于唐玄宗的。胡旋舞传入中原之后，极为盛行，白居易诗云：“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④]胡旋舞的兴盛与其展现的舞姿之优美传神是分不开的。“弦鼓一声双袖举， 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⑤]胡旋舞的轻盈、迅疾、变化多端、激烈欢快，令人眼花缭乱，与盛唐的精神风貌高度契合，使得它在盛唐盛极一时，“五十年来制不禁”[⑥]、“五十年来竞纷泊”[⑦]。玄宗对胡旋舞的偏爱给了谄媚之人以可乘之机。《旧唐书·安禄山传》载安禄山“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 ，重三百三十斤，每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⑧]杨贵妃的舞姿更是宛若天人，深谙玄宗之喜好，所以才有了诗人笔下的“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禄山

①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 1071 页。
②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 册，第 162 页。
③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中册，第 737 页。
④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 册，第 162 页。
⑤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 册，第 162 页。
⑥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 册，第 162 页。
⑦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中册，第 727 页。
⑧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 3652 页。

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①]“佞臣闻此心计回，荧惑君心君眼眩。君言似曲屈为钩，君言好直舒为箭。”[②]

元、白二人的诗歌都不同程度地描绘了胡舞、胡乐演出时的盛况，但是诗人的目的并不是再现盛世繁华。晚年的玄宗不问政治，沉迷于声色歌舞中，将国家大事都交给身边的权臣来处理，最终酿成大祸。《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载：“上晚年自持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变，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③]诗中胡舞、胡乐演奏时的奢华场景是玄宗耽于享乐、骄奢淫逸的表现，是诗人强烈批判，并希望当朝统治者引以为戒的。元稹的“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白居易的“戒近习也”、“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都是诗人讽谏意图的表达。

安史之乱后，胡舞、胡乐、胡服、胡妆等胡文化在当时社会依然有所保留，但是由于对安史之乱心有余悸，中唐社会对胡文化产生了反对和抵抗的心理，这在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歌中有明确表征。《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元和末，妇人为回畏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④]白居易在《时世妆》中写道：“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⑤]诗人描写了由西北少数民族传来的女子妆容的特点，但目的是“儆戒也”，对时世妆的排斥态度十分明确。

此外，从诗人对外来少数民族及其带来的异域事物的认知上，即可看出诗人对玄宗朝的“胡风”之反对。元稹在“泗滨浮石裁为磬，古乐疏音少人听。工师小贱牙旷稀，不辨邪声嫌雅正”[⑥]中将西域之声称为“邪声”。白居易也有“华源磬，华源磬，古人不听今人听。泗滨石，泗滨石，今人不击古人击。古称浮磬出泗滨，立辨致死声感人。宫悬一听华源石，君心遂忘封将臣”[⑦]之句，意在批判胡乐使君臣沉迷享乐，不思进取。胡人乱华，却使胡人之乐风靡于圣朝，岂不是莫大的讽刺！诗人对西域少数民族的称呼有“胡骑”、“豺狼”、“妖胡”、“胡寇”，称其音乐为“夷音”、“邪声”、“浊声”，认为自胡乐传入，雅乐不存，古乐萧疏，“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⑧]。这些词眼不仅含有诗人的鄙夷，更多的是“乐与政通”的谏言。元、白等中唐诗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知，无非缘于安禄山的胡人身份，而他又是致使盛唐颠覆的罪魁祸首。

---

①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册，第162页。
②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中册，第737页。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914页。
④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75页。
⑤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册，第234页。
⑥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中册，第720页。
⑦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册，第153页。
⑧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册，第727页。

对胡文化的反对是中唐文人为避免重蹈覆辙，维护统治稳定而采取的理性“反击”。“随着被涵化民族的觉醒，他们希望找回自己丧失的固有文化，恢复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①]元、白在诗歌中批判盛唐时期风行的胡文化，除了安史之乱带来的心理阴影外，长期的华夏民族的优越感也使他们在安史乱后这个特殊时期对华夷之分更为明确。“在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对夷狄具有绝对控制权和影响力的时代，严申‘夷夏’之别的声音并不突出，而每当内忧外患凸显时，‘夷夏’之辩或者‘华夷’之别这个恒久的儒学命题总是被推到显眼的位置，倾向儒家的文人常常在文章中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申明夷狄的低劣和华夏的优越”。[②]尽管唐太宗和唐玄宗统治时期都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接纳外来文化，也仍然有“戎狄豺狼，非我族类”[③]、“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④]的观点。

由此可知，“华夷一家亲”的前提是唐王朝国力强盛，文化开放，具有宽广的胸怀来容纳外来文化。反观中唐，安史之乱的巨大破坏力使唐王朝再难复兴，加上罪魁祸首乃是胡人，再要求中唐文人怀着开放的心态包容异域文化，恐怕是强人所难，他们对胡文化的排斥也可以想见。韩愈的《原人》中多次出现“夷狄禽兽”并称，并将之排除在“人”的范畴之外，声称“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⑤]，这是对外来民族的强烈鄙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白居易和元稹在新乐府中将盛唐衰败归因于玄宗对胡舞、胡乐的沉迷，这是不全面的。中唐诗人对少数民族的鄙夷也一样具有时代局限性。盛唐倾颓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不能只归咎于玄宗单方面的原因，或是认为胡舞、胡乐魅惑君心，我们应以客观理性的的眼光看待历史。

第三节　中唐诗歌中的盛唐之将相任用

盛世的出现与明君贤臣密不可分，安于现状的国君和佞臣贼子则会导致盛世衰微。玄宗统治初期，励精图治，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贤相，“在玄宗时，则有姚、宋，辅开元之化”[⑥]正是这些肱骨之臣的辅佐，才得以开创开元盛世的局面。长久太平、国家无事使玄宗忘记了居安思危，天宝之后，玄宗日渐怠政，政治越来越腐败。他宠幸杨贵妃、安禄山，军国大事交由李林甫、杨国忠处置，最

① 孙秋云主编：《文化人类学教程》，民族出版社，2004 年版，第 47 页。
② 何蕾：《中唐“夷夏”观念之转严与边塞诗创作的衰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 年第 3 期。
③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 2251 页。
④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 5162 页。
⑤ 马其昶校注，马茂源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 25 页。
⑥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 5 册，第 3111 页。

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载："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已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之不寤也。"①

元稹在《连昌宫词》中评说了开元盛世姚崇、宋璟为相时的治世景象："姚崇宋璟作相公，劝谏上皇言语切。燮理阴阳禾黍丰，调和中外无兵戎。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②开元年间，玄宗励精图治，任人唯贤，虚怀纳谏，呈现的是物阜民丰、风调雨顺、河清海晏的盛世。元和元年，元稹在策对中称颂玄宗统治初期的治世局面："明皇即位，实号中兴，方其任姚、宋而右贤能也，虽禹汤文武之俗，不能过焉。四十年间，刑罚不试，人用滋殖，四海大和。"③白居易进士策问的"玄宗以圣文之德，致天下之肥"④同样是对开元盛世的赞颂。可见元、白二人对玄宗统治初期的政绩是相当欣赏的，但是玄宗统治后期对于自己开创的太平盛世甚是自得，渐渐耽于享乐，荒废国政。元稹在《连昌宫词》中借老人之言揭示了玄宗从任人唯贤到任人唯亲所导致的后果，分析了"太平致乱"的原因："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庙谟颠倒四海摇，五十年来作疮痍。"⑤姚崇之后，玄宗先后以李林甫、杨国忠为相，使朝政日非。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又使外戚飞扬跋扈，对安禄山的宠信竟达到了不辨是非的地步。诗人通过今昔对比的方式，层层深入，分析致乱之由，对玄宗用人不当，助纣为虐的行为给予了批判。白居易的"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⑥与元稹这一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皆以贤相、奸相执政产生的不同政治局面相比较，言明明君贤臣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元稹是出于强烈的使命感批判玄宗统治后期的将相任用，而长期被逐的诗人刘禹锡在写到盛唐宰相张九龄时更多地是联想个人遭遇抒发逐臣之激愤。

在《读张曲江集作》中，刘禹锡借机抒发了自己对于被贬至荒蛮之地的愤懑。诗题下附诗人的写作缘由：

> 世称张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及今读其文，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门，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有骚人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

①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914页。
②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中册，第706页。
③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中册，第818页。
④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册，第2843页。
⑤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中册，第706页。
⑥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册，第166页。

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凡器与同列，密启廷争。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邪。不然，何袁公一言明楚狱而钟祉四叶，以是相较，神可诬乎？予读其文，因为诗以吊。[①]

张曲江即玄宗朝贤相之一张九龄。诗人在这段文字中并不认可后世对张九龄的评价。张九龄曾“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刘禹锡认为正是因为玄宗采纳了张九龄的建议，之后的罪臣才有了被贬至瘴疠之地的遭遇。诗人接下来又言明张九龄当年从朝廷机要人物下放到桂州时，也有“瘴疠之叹”，这不是“自作孽不可活”吗？明明自己出身于岭南偏远之地，失意的时候却难以承受，难道非要将中原士人贬谪到蛮荒之地才大快己心吗？后世皆认为张九龄是贤相，能识破安禄山的谋反之心，也能不畏君颜，力劝玄宗任用贤能之才，即使是古时的哲人也比不上他。但是刘禹锡却否定了这一点，他认为张九龄子嗣未能像东汉袁公一样四世三公任宦，皆源于此“法”。所以诗人在诗歌中写道：“圣言贵忠恕，至道重观身。法在何所恨，色相斯为仁。良时难久恃，阴谪岂无因。寂寞韶阳庙，魂归不见人。”[②]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读出诗人的怨气之大。张九龄的一句“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竟足以让刘禹锡否定他是盛唐的贤相，并用不合史实的言辞来证明这是其“报应”。故有诗评曰：“……岂梦得困于迁谪，有所激而言。”[③]《新唐书》卷一六八《刘禹锡传》评：“禹锡久落魄，郁郁不自聊，其吐辞多讽托幽远”[④]，并引此诗引，言诗人：“欲感讽权近，而憾不释。”[⑤]在这首诗中，诗人借盛唐人物抒发自己无罪而遭贬的悲愤。至于《新唐书》所言“欲感讽权近”，瞿蜕园以为：“宜莫如武元衡。”[⑥]时“宰相哀其才且困，将澡濯用之，会程异复起领运务，乃诏禹锡等悉补远州刺史。而元衡方执政，谏官颇言不可用，遂罢。”[⑦]盖诗人有感于此，故借张九龄之事讽武元衡。虽然刘禹锡在诗歌中对张九龄颇有微词，但需要说明的是，刘禹锡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张九龄作为一代贤相，他的建言并非针对某人，更别提年代在他之后的刘禹锡了。

玄宗统治期间之所以出现盛世局面，与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分不开的，而驻守边疆的将领更是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盛唐时期的西凉是边疆的繁华之地，安史

①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中册，第568页。
②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中册，第569页。
③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中册，第570页。
④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29页。
⑤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29页。
⑥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中册，第571页。
⑦ （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29页。

之乱后，凉州陷落。元稹、白居易作同题新乐府《西凉伎》将凉州当年的繁华与今日的荒废相对比。昔日是“人烟扑地桑柘稠。蒲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①]，人口众多，物产富饶，人不知愁，乱后却是“河湟没尽空遗丘”[②]，边疆之地丧失，疆域缩小。这样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诗人经过分析归因于戍边将士的安于享乐，不思进取。他们沉迷歌舞，寻欢作乐，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前头百戏竞撩乱，丸剑跳踯霜雪浮”[③]，国土沦陷却毫无愧意：“奈何仍看西凉伎，取笑资欢无所愧”[④]，诗人不由得反问道：“连城边将但高会，每听此曲能不羞。”[⑤]

白居易的《西凉伎》注明：“刺封疆之臣也”[⑥]，元白二人的讥刺对象无疑是一致的，谴责边将只知享乐，不思强兵戍边。借古的目的既是为了讽今，那当朝统治亦必有类似之现状。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已对元、白诗《西凉伎》的写作背景予以清晰考证：

> 自安史乱后，吐蕃盗据河湟以来，迄于宪宗元和之世，长安君臣虽有收复失地之计图，而边镇将领终无轻略旧疆之志意。此诗人之所以同深愤慨，而元白二公此篇所共具之历史背景也。微之少居西北边镇之凤翔，殆亲见或闻知边将之宴乐嬉游，而坐视河湟之长期沦没。故追忆感慨，赋成此篇。颇疑其诗中所咏，乃为刘昌辈而发。既系确有所指，而非泛泛之言，此所以特为沉痛也。[⑦]

元稹和白居易在诗歌中既描绘了太平之盛景，又一再以批判的态度写到玄宗后期的政治情况，其用意显而易见。他们二人继承了乐府诗歌“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直陈时弊，以盛唐之世讽谏君王，无论对于新乐府的创作，还是对于中唐的统治都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

①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中册，第724页。
②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中册，第724页。
③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中册，第724页。
④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册，第210页。
⑤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中册，第724页。
⑥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册，第210页。
⑦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3页。

第四章　盛唐书写的意义和影响

中唐诗人书写盛唐，表达自己对盛唐的怀念、对盛世不再的哀伤，也有对盛唐人事的批判。诗人在表达主观情感的同时，使盛唐在他们笔下经历了一种由真实书写到想象加工的过程，这也是对文学的继承与创新。中唐诗人书写已经成为历史的盛唐，这本身就是对咏史怀古这一传统诗歌主题的延续，而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关于李杨故事的书写，它使“杨贵妃”这一以人物为中心的母题在中唐形成，时代的距离又使“杨贵妃”这一形象在之后的文学作品中不断被重新塑造，丰富了“杨贵妃”这一母题的内涵。读这些诗歌会发现，无论中唐诗人持何种态度书写盛唐，书写的是太平盛景还是满目疮痍，他们的诗歌中都蔓延着绵长而深切的感伤基调，这是特殊时代背景下中唐诗人悲剧意识的体现。

第一节　咏史怀古主题的延续

咏史怀古是我国古典诗歌中频频出现的文学主题，在这里首先对咏史怀古进行阐释。严格意义上，咏史与怀古是有区别的。有学者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议论和抒情两种成分的多少。咏史偏于议论，态度是智性的；怀古则偏于抒情，态度是感性的[①]。但是这种说法在具体的诗歌中很难区分开来，一首诗歌如果以饱含感情的议论抒发个人情感，我们就难以区分它是咏史还是怀古。另有学者从咏史和怀古感情的触发点考察，认为咏史是有感于某一历史事实，怀古是有感于某一历史遗迹[②]。这种看法似乎更好把握，只要诗歌中出现明确的历史事件或是历史遗迹，就可以区分咏史与怀古。但是如果历史事件与历史遗迹同时出现在诗歌中，就又难以辨别了。实质上，咏史和怀古诗都是以时间为坐标，对过去时代人事的追忆或遥想。中唐诗人书写盛唐往往即是如此，而且在诗中历史事件和历史遗迹往往同时出现，抒情与议论兼而有之，因此在这里不对咏史和怀古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区分，统称为咏史怀古。

一、咏史怀古主题的延续

诗人们登高望远、临风凭栏、吊古寻幽之时大都会生发出怀古之幽情，或由古人念及自身遭遇，抒发身世、命运之悲，或将古时与今时对比，生发怀古忧今

① 张润静：《唐代咏史怀古诗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 年版，第 3 页。
② 陈建华：《唐代咏史怀古诗论稿》，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8-12 页.。

之情。中国古典诗歌从《诗经》开始就有了咏史怀古的传统。经历了先秦、魏晋，一直到唐代，诗人的咏史怀古的热情从不曾退却。初盛唐时期，诗人们沉浸在蓬勃向上的太平盛世中，借古抒怀或借古讽今的诗作并不多。至开元末、天宝初期，唐王朝的社会弊端日渐显露，诗人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现实的不满创作咏史怀古的诗篇。诗歌中更多的是透过历史对现实社会的反思。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蜀相》《武侯庙》《八阵图》《遣兴》等诗歌在赞颂和同情历史人物的同时，寄寓了自己漂泊无依、壮志难酬的身世之感，也体现了咏史怀古类诗歌在艺术上的成熟。中晚唐时期，咏史怀古诗歌在数量和技巧等方面都大大超越了前代的创作。

据杨恩成《论唐代咏史诗》统计，“现存的5万多首唐诗（包括《全唐诗外编》和近几年新发现的唐代佚诗）中，咏史诗有1500多首，占总数的3%。”[①]雷恩海对这一数据又进行了补充说明：“唐以前咏史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有30位诗人约50首作品，400余年间创作了寥寥几十首，这一体类诗歌的创作不能不说是寂寞的。至于唐代咏史诗，据清编《全唐诗》和陈尚君《全唐诗补编》统计，已达1600首，其中初唐约60首、盛唐150首、中唐290首、晚唐1100首，咏史诗作者初唐20人、盛唐30人、中唐70人、晚唐95人。”[②]二人并未区分咏史诗与怀古诗，这一统计应是就所有咏史怀古类诗歌所言，由此可见中晚唐时期出现了咏史怀古诗歌创作的高潮。

中晚唐诗人咏史怀古，上至春秋时代，下至盛唐，诗人们总结历代亡国之教训，借古讽今，以求统治者引以为戒。其中对时代距离最为接近的盛唐的书写虽然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同样是对这一主题的延续。王立在《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中将怀古主题列入其中，并概括出该主题发展的两条基本轨迹“借史事以咏己之怀抱”和“经古人之成败以咏之”[③]。中唐诗人沿着这一轨迹书写盛唐，或借古咏怀或借古讽今，前者是抒发个人之情感，后者则是着眼于国家社稷。唐人咏唐多咏盛唐，这是盛唐情结的体现。盛唐是中国古代太平盛世难以超越的典范，因此无论是再现盛世繁华，还是借古讽今，都表现着盛唐在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才得以被后世不断咏怀。中唐是距离盛唐最近的时代，生活在中唐的诗人对盛唐之世的追忆或遥想，并没有脱离咏史怀古的范畴，与唐人咏汉魏的诗歌相比，更多了几分历史的真实性，这在大历诗人对盛唐的书写中体现的更为明显。

---

① 杨恩成：《论唐代咏史诗》，《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第62-70页。
② 雷恩海、吴定泫：《明丽青春的追求与迷惘——盛唐咏史诗述论》，《复旦学报》，1999年第2期，第42-45页。
③ 王立：《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二、时、地、人、事的结合

在继承咏史怀古主题的基础上，中唐诗人在对盛唐的追忆和遥想中还呈现出时、地、人、事相结合，在时空跳跃中借古咏怀的特点。咏史怀古诗中时常体现出时间的流动与空间的转换，伴随着时空变化的是诗人们独特的情感体验，小至个人命运的沧桑感，大到国家兴亡的历史感。陆机在《文赋》中言及触发作家情感的因素时说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①]，“四时”、“万物”即是指自然界的时间空间。时空交错的变化往往能触发诗人敏感的神经，使他们“见古迹，思古人”。

韦应物的“干戈一起文武乖，欢娱已极人事变。圣皇弓剑坠幽泉，古木苍山闭宫殿”[②]囊括了安史乱起玄宗仙逝，故地一片荒凉的沧桑之变。顾况的“玉座凄凉游帝京，悲翁回首望承明。云韶九奏杳然远，唯有五陵松柏声”[③]由现实到往昔，再由往昔到现实的今昔跳跃中更显诗人伤时之悲。张继的“天宝承平奈乐何，华清宫殿郁嵯峨。……只今惟有温泉水，呜咽声中感慨多”[④]亦是由古及今，今昔对比中突显今日华清宫的荒凉破败。元稹的“洛阳昼夜无车马，漫挂红纱满树头。见说平时灯影里，玄宗潜伴太真游”[⑤]，由洛阳元宵节灯会之盛景遥想玄宗与杨贵妃的元宵之游，今时今地到古人古事的转换，自然流畅又回味无穷。再如卢纶的《华清宫》：“汉家天子好经过，白日青山宫殿多。见说只今生草处，禁泉荒石已相和。”[⑥]李端的《赠李龟年》：“青春事汉主，白首入秦城。……独有垂杨树，偏伤日暮情。”[⑦]面对盛唐遗迹不能不想起盛唐的人事，时、地、人、事的结合构成的古今观照使诗歌余味隽永。

诗人在这种时地人事的结合的结合中往往呈现出虚实结合，亦真亦假的书写，尤其是未经历过盛唐之世的诗人对盛唐的书写。他们多凭借想象或是自身经历遥想盛唐，这些遥想多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但是诗人为了抒情言志就对其进行了适度的联想和夸张。刘禹锡在《马嵬行》中借“里中儿”之言述说了马嵬之变赐死贵妃之事：“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晖。贵人饮金屑，倏忽舜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⑧]马嵬坡上发生的故事真的就如里巷小儿所言吗？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上有相关记载：“玄宗幸蜀，至马

① （西晋）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②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80页。
③ 王启兴、张虹注：《顾况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页。
④ 周义敢注：《张继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⑤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上册，第541页。
⑥ 刘初棠注：《卢纶诗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08页。
⑦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251页。
⑧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中册，第798页。

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马嵬店媪收得锦蜀幼一只，相传过客每一借玩，必须百钱，前后获利极多，媪因至富。”[①]这些记载概为朝野轶事，刘禹锡在诗中所言也未必可信。元稹的《连昌宫词》也不同程度地在史事的基础上加入了艺术想象。据陈寅恪考证，玄宗和杨贵妃并未巡幸连昌宫[②]，但元稹在诗歌中借连昌宫老人之言描绘了二人在连昌宫的奢华生活，其中很大部分都是根据诗人宫廷生活的经历和历史传闻构思而成，所以读来既有真实性，又有艺术性。

三、感伤基调的呈现

“逝事不回的憾恨与自我情感抒发的需要，连同中国文学的忧患意识，决定了历代怀古者的眼中常含泪水。”[③]中唐诗人在追忆和遥想盛唐时，就常含这样的“泪水”，他们为个人命运而感伤，为李杨爱情而感伤，更为繁盛时代的逝去而感伤，使诗歌充满感伤基调。

大历诗人经历了盛唐的繁华与衰败，对诗人个体来说，自身境遇的变化带来的落差感直接导致了诗人内心的感伤。昔日惬意的生活、尊贵的地位变为如今的孤寂冷清、穷困潦倒、不得不屈居人下，内心的煎熬可想而知。韦应物首先在诗中表达了这种痛苦：“趋府不遑安，中宵出户看。满天星尚在，近壁烛仍残。立马频惊曙，垂帘却避寒。可怜同宦者，应悟下流难。”[④]即将趋赴公府参见长官，内心惶恐难安，夜不能寐……曾经少年得意，如今“憔悴被人欺”，沦落“下流”，地位卑微，只能“自叹犹为折腰吏”。在感慨今昔巨变的同时，面对时光流逝，老之将至，诗人作《叹白发》表达“时役人易衰，吾年白犹少”的悲哀和无力感。顾况的“却来书处在，惆怅似前生”、戎昱的“年少逢胡乱，时平似梦中”无不流露出人生如梦的虚无感。

李杨故事也时常在中唐诗人心中激起感伤的情思。开天盛世的诗人在书写李杨故事的时候，都是带着蓬勃向上的盛唐气象。杨贵妃在李白的笔下是倾国倾城的神女：“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⑤]，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则是：“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⑥]盛世的一切在当时似乎都是值得颂扬的，安史之乱后，李杨故事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意义。批判、讽刺之外，对二人的同情使中唐诗人的诗歌中多了几分感伤。诗人在写李杨故事时常借古殿的门可罗雀、杂

① 李肇：《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9 页。
②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 82 页。
③ 王立：《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辽海出版社，2002 年版，第 222 页。
④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 72 页。
⑤ 瞿蜕园、朱金城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 389 页。
⑥ 瞿蜕园、朱金城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第 393 页。

草丛生、秋叶满地来营造荒凉破败、萧条冷清的景象，在今昔对比中流露出感伤的情绪。如王建的《霓裳词十首》之十："知向华清年月满，山头山底种长生。去时留下霓裳曲，总是离宫别馆声。"[①]张继的《华清宫》："只今惟有温泉水，呜咽声中感慨多。"[②]白居易的《长恨歌》可以说是中唐诗人感伤李杨故事的巅峰之作，一句"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③]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对李杨爱情深切的同情，那种相爱之人不能相守的浓烈感伤溢于言表。

中唐诗人在书写盛唐时还流露出对时代的感伤。中唐诗人对时代感伤来自于安史之乱带给他们的心灵创伤和国家中兴希望的破灭。张继的"天宝承平奈乐何，华清宫殿郁嵯峨。……只今惟有温泉水，呜咽声中感慨多"[④]是因盛世不再而生发的感伤。刘禹锡在《杨柳枝词九首》其五中以杨柳的荣枯喻唐王朝的由盛而衰："花萼楼前初种时，美人楼上抖腰肢。如今抛掷长街里，露叶如啼欲恨谁？"[⑤]这是为唐王朝逃避不了盛衰交替的历史规律而产生的悲哀。忧国忧民的诗人总是能以最敏锐的触觉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安史之乱前，杜甫就感受到了太平盛世背后的"山雨欲来风满楼"[⑥]，发出"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⑦]的深切忧虑。面对乱后风雨飘摇的唐王朝，诗人们再也没有了积极的政治热情，取而代之的是对社会现实的失望、理想的破灭和信念的丧失。但是心怀家国的诗人不会长久地沉浸在时代的感伤中，他们希望匡正时弊，挽救国运。元和时期，元、白在新乐府中以盛唐人事谏君王，正是因为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弊端，怀着"兼济天下"的责任与抱负，他们赋予诗文"为时、为事"而作的使命，以之"美刺"君王、"补察时政"。这是在时代的感伤中寄希望于统治者的觉醒而寻求免于感伤的途径。

中唐诗人书写盛唐的诗歌是对咏史怀古主题的延续，与此同时，以情为主到以理为主的变化又为晚唐咏史怀古诗歌提供了借鉴，此外它所呈现出的时地人事相结合的特点又使诗歌充满丰富的意蕴。对盛唐的追忆和遥想中蕴含着中唐诗人的浓郁的个人感伤、对李杨故事的感伤和时代感伤。

第二节　"杨贵妃"文学母题的形成与嬗变

① 王宗堂校注：《王建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41页。
② 周义敢：《张继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③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661页。
④ 周义敢注：《张继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⑤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中册，第858页。
⑥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085页。
⑦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68页。

中唐诗人在诗歌中追忆和遥想盛唐时，不可避免地追溯李杨故事，他们的书写使李杨故事越来越富有故事性和传奇性，杨贵妃的形象也越来越具有可塑性和阐发性，是“杨贵妃”这一文学母题形成的开端。

一、“杨贵妃”成为文学母题的原因

“母题”一词来源于西方，最早是由美国民俗学家汤普森在《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一书提出的。胡适在1924年3月研究民间歌谣时引入这一概念，并将其英文“motif”译作“母题”。他在《白话文学史》第八章中讲到陈后主的《三妇艳词》时也提到了“母题”这一概念[①]。虽然“母题”这一术语在中国文学研究中经常被提及，但是关于母题的定义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结论。汤普森在《民间故事分类学》中认为：“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的和动人的力量。”[②]中国学者陈建宪在他的神话学专著《神祇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一书中这样定义母题：“什么是母题呢？简言之，母题就是民间叙事作品（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叙事诗歌等）中最小的情节元素。这种情节元素具有鲜明的特征，能够从一个叙事作品中游离出来，又组合到另外一个作品中去。它在民间叙事中反复出现，在历史传承中具有独立存在能力和顽强的继承性。它们本身的数量是有限的，但通过不同的组合，可以变换出无数的故事。[③]乐黛云在《中西比较文学教程》中指出：“主题学研究中的母题，指的是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④]“文学母题的生成，除了文化模式的规范与民族心理集体无意识的作用，还离不开某一历史时期流行的习俗和价值观念，在其或显或隐的制约下，人们遂对于某一母题产生了趋同心理及创作现象。”[⑤]从他们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简单概括出母题的一些基本特点：在历史传承中能不断被塑造，具有可持续性、可阐发性。杨贵妃这一文学题材之所以能成为文学母题，就是因为它具备这些特点，从而使她的形象不断被塑造，在文学作品中重新组合，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故事传播愈广，时间愈长，演变也就愈大；但无论演变到什么程度，里面总留下点痕迹，让人们可以追踪它们的来源来。”[⑥]追溯“杨贵妃”这一文学母题的形成，会发现它与李杨故事的广泛流传密不可分。

---

①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② （美）st.汤普森：《民间故事分类学》，郑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
③ 陈建宪：《神祇与英雄》，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页。
④ 乐黛云：《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⑤ 王立：《中国古代文学主题思想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0页。
⑥ 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作为盛唐之世的帝妃，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当时就成为诗人们的创作题材。安史之乱爆发，杨贵妃被玄宗赐死，之后关于二人故事的诗文流传更多了。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唐人竟以太真遗事为一通常联系诗文之题目，此观于唐人诗文集即可瞭然。"[①]据统计，唐代有关杨贵妃题材的诗歌共有 180 多首，其中盛唐 17 首，中唐 62 首，晚唐 106 首。李杨故事在文学作品中的不断衍化，使杨贵妃这一形象具有反复塑造性和可阐发性，为其成为文学母题提供了可能。

乐黛云将文学母题的研究分为三类：纯粹母题研究、情境母题研究、人物母题研究。[②]"杨贵妃"这一母题无疑属于人物母题研究。研究以人物为中心的母题，首先要了解这一人物原型的特殊性。杨贵妃为人所熟知，缘于她是唐玄宗的贵妃这一历史事实。如果没有唐玄宗，身为寿王妃的杨贵妃大概也只是史书上被轻描淡写的人物。宋乐史所著《杨太真外传》中这样记载杨贵妃："妃早孤，养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家。开元二十三年十一月，归于寿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自天宝六载十月，复改为华清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③]唐玄宗"父夺子媳"的行为违背了封建伦理纲常，使杨贵妃的身份和二人的关系一开始就具有了特殊性，为后人提供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极度宠爱使杨贵妃备受诟病，后人对杨贵妃的论说经常涉及"女色误国"的政治论调。白居易的"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虽说是艺术的夸张，但也不乏历史的真实。唐玄宗曾明言："朕得杨贵妃，如得至宝也！"杨贵妃进宫后，之前备受宠爱的武惠妃渐渐失宠，杨贵妃的家人也因裙带关系身居高位。后人对唐玄宗的批判也常常着眼于他爱屋及乌，对杨贵妃及其家人的纵容方面。且不说帝妃爱情是否存在，单就受到唐玄宗如此的宠爱，杨贵妃就足以成为后人谈论的焦点。

安史乱起，玄宗逃难至马嵬，"六军不发无奈何"[④]，众怒难犯之下，玄宗"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唐玄宗赐死杨贵妃，使杨贵妃这一形象具有了更多的悲剧意味。后人关于马嵬驿故事和杨贵妃身后事的衍化也丰富了李杨故事这一创作题材。

从寿王妃到杨贵妃，身份的转变、玄宗的宠爱、被玄宗赐死这一系列有关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都使杨贵妃的形象具有了多义性和可阐发性，是"杨贵妃"这一文学母题形成的基础。

---

①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 13 页。
② 乐黛云：《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92 页。
③ 鲁迅校录，王中立译注：《唐宋传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第 395 页。
④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 2 册，第 661 页.

二、“杨贵妃”文学母题的嬗变

“母题传说，往往不是自然地保持其生命力的，其需要在后世不同时代不同文本中有新的组合，以维持并发生其在某一稳定信仰下对人们兴趣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只有不断地在新文本中为人们不断重复的母题才愈加具有新鲜的活力。”[①]同理，正是后世文学作品对李杨故事的不断敷衍赋予了“杨贵妃”旺盛的生命力，才使之成为永恒的文学母题。“杨贵妃”文学母题的嬗变主要表现在作品主题思想的变化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杨贵妃题材进入文学作品后，随着时代及其观念的变化，其形象也不断变化。围绕后世作品中塑造的不同的杨贵妃形象，世人对杨贵妃的态度主要有同情、批判、颂扬三种。

（一）卿本佳人，实非祸水：对杨贵妃的同情

考察涉及李杨故事的作品可知，世人对杨贵妃的同情是建立在李杨爱情悲剧和红颜无罪的基础上的。在文学作品中，前一种同情主要表现为对二人真挚情感和悲剧意蕴的渲染，后一种同情表现为诗人对“红颜祸水”论调的愤慨，甚至于为杨贵妃“翻案”。

对杨贵妃的同情从杜甫开始就已有之。安史之乱爆发后，至德二载（757）春，杜甫作《哀江头》诗，由曲江所见之景由盛转衰的变化，联想到杨贵妃备受玄宗宠爱，终被缢死的史事。哀伤故国的同时，对李杨二人寄寓深切的同情：“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②]昔日的“明眸皓齿”，今朝的“血污游魂”，今昔对比之下，诗人对李杨天人永隔的悲剧表现出深切的同情。之后的诗人在诗歌中表达对贵妃的同情的也不在少数。李益的《过马嵬》：“汉将如云不直言，寇来翻罪绮罗恩。托君休洗莲花血，留记千年妾泪痕。”[③]诗歌以杨贵妃的口吻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汉将”：安禄山叛乱，他们不去御寇，反而归罪于宫中妇人……对杨贵妃的同情使诗人的感情一变而为愤慨。晚唐徐夤的《开元即事》中“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④]、《马嵬》中“百年来事远闻，从龙谁解尽如云。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⑤]处处可见诗人为杨贵妃鸣不平，如果不是同情贵妃的遭遇，不是理性地看到王朝兴衰罪不在贵妃，又何来“平反”之说！

中晚唐诗歌中将对杨贵妃的同情发挥到极致的非白居易的《长恨歌》莫属。“一篇长恨有风情”，全诗围绕李杨二人的爱情故事展开，首先对杨贵妃的美貌

---

① 王立：《中国古代文学主题思想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7页。
②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60页。
③ 范之麟：《李益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④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171页。
⑤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188页。

和专宠进行大肆渲染，后以大量篇幅写贵妃死后玄宗对她的思念，虽然在道士的帮助下二人得以“再续前缘”，但是依然难以摆脱仙人两隔的悲凉结局。作者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①]之极尽夸张的手法结束全诗，使作品的悲剧意蕴达到高潮，诗人对李杨二人的同情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宋乐史所著《杨太真外传》“采摭史料，纂辑成篇”[②]，在采录《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等资料的基础上叙写了杨贵妃的生平故事。作品主体还是围绕李杨二人的爱情故事来写，但是突出了杨氏家族的骄奢淫逸，并把亡国之罪的矛头指向了杨国忠：“（玄宗）乘舆迁播，朝廷陷没，百僚系颈，妃主被戮，兵满天下，毒流四海，皆国忠之召祸也。”[③]同时作者对唐玄宗的荒淫误国也进行了批判：“唐明皇之一误，贻天下之羞，所以禄山叛乱，指罪三人，今为外传，非徒拾杨妃之故事，且惩祸阶而已。”[④]《杨太真外传》与《长恨歌》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在借亡国之事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同时，作者在少君求魂、崩驾仙会两处情节中，极度渲染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感人至深的爱情。“我若就枕，慎勿惊我”，玄宗为与贵妃重聚甘愿赴死的决心是二人真情的明证，也是作者对二人遭遇之同情的表现。

白朴的元杂剧《梧桐雨》与《长恨歌》类似，也着眼于对李杨爱情悲剧的书写。这部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马嵬事变中陈玄礼请诛杨贵妃，玄宗为贵妃开脱的情节描写：“岂可教妃子受刑罚？他见请受着皇后中宫，兼踏着寡人御榻。他又无罪过，颇贤达。须不似周褒姒举火取笑，纣妲己敲胫觑人。早间把他个哥哥坏了，总便有万千不是，看寡人也合饶过他，一地胡拿。”[⑤]众怒难犯，贵妃还是不得不死。尽管玄宗改变不了最终的结局，能为贵妃开脱起码可以证明其真心。剧作最后，秋雨打梧桐的虚写让人联想到玄宗“雨滴人心碎”的真实心境：“斟量来这一宵，雨和人紧厮熬。伴铜壶点点敲，雨更多泪不少。雨湿寒梢，泪染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⑥]富有诗意的悲戚氛围与人物的凄凉心境融为一体，使李杨二人的爱情故事更惹人同情。

清代洪昇的《长生殿》在《长恨歌》和《梧桐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化了李杨爱情。第一出《传概》中，作者即交代了创作此剧的目的：“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⑦]作者剔除了一切有可能损害李杨爱情的描写，对李杨爱情寄寓

①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661页。
② 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③ 鲁迅校录，王中立译注：《唐宋传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9页。
④ 鲁迅校录，王中立译注：《唐宋传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9页。
⑤ 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⑥ 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⑦ 徐朔方校注：《长生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极大同情，一定程度上是对他们真挚情感的赞美。虽然杨氏家族的飞扬跋扈与骄奢淫逸与贵妃不无关系，但是作者在剧中并未直接提到杨贵妃，这不能不说是作者为了突出“真心”二字，对杨贵妃的“有意保护”。在《倖恩》一出中，作者把《杨太真外传》中杨贵妃的两次离宫合并为一次，原因是唐明皇与虢国夫人纠缠不清，杨贵妃让他们两不欢，因此被赶出宫。作者这样安排剧情，足以见杨贵妃因爱生妒的值得同情，更表明其对唐明皇的真心。

由此可见，唐代以来有关李杨故事的文学作品，从唐诗到宋传奇、元杂剧再到清戏曲，或多或少都传达出对二人的同情，而且这一同情表现得越来越鲜明，这不仅缘于李杨故事的悲剧收场，更与作者“未必蛾眉能破国”的态度有关。

（二）悍妒宠妃，女色祸国：对杨贵妃的批判

作为开天盛世的帝妃，杨贵妃可以享受一切对她的赞美，但是作为亡国之君曾经的宠妃，她死后依然免不了被批判，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悍妒和“女色祸国”两方面。

安史之乱爆发前，杜甫就有对杨氏家族的批判。天宝十二载（753）杜甫困顿于长安，作《丽人行》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杨贵妃家族的豪华和声势之烜赫，其中“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①]对杨氏家族的骄纵、奢华给予了强烈谴责。“杨花雪落覆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②]暗喻杨国忠与从妹虢国夫人兄妹苟且之事，对杨国忠的嚣张气焰进行揭露和批判。

在杜甫之后，围绕杨贵妃女色祸国的批判声也不绝如缕。有刘禹锡“军家诛戚族，天子舍妖姬”的“妖姬”说、元稹“开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渐渐由妃子”的“参政”说、白居易“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的“妒妇”说和“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的“惑君”说等等。晚唐批判杨贵妃的也多从这些角度来谈。

关于杨贵妃善妒之事，《杨太真外传》记载天宝五载（746）杨贵妃第一次出宫就是因为“悍妒忤旨”[③]。宋代无名氏的《梅妃传》、明代的吴世美的《惊鸿记》皆以唐玄宗、杨贵妃、梅妃三人为主角，有梅妃得宠、杨妃进宫、两妃争宠的情节，杨贵妃在其中被塑造为“悍妒宠妃”的形象。《梅妃传》中说：“太真忌而智，（梅）妃性柔缓，亡以胜。”[④]在《惊鸿记》中，高力士向梅妃言明遭贬斥的

①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2页。
②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2页。
③ 鲁迅校录，王中立译注：《唐宋传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页。
④ 鲁迅校录，王中立译注：《唐宋传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页。

原因："他（杨贵妃）"说道娘娘私通太子，诅咒君王……"[①]正是杨贵妃的嫉妒使她费尽心机向玄宗进谗言，最终使梅妃被打入冷宫。两部作品中均有杨贵妃大闹翠华西阁的情节，唐玄宗因思念梅妃，"密以戏马召妃至翠华西阁"，却被杨贵妃发现，"上披衣，抱妃藏夹幕间"，杨贵妃步步紧逼，"大怒"、"太真怒甚"[②]充分说明杨贵妃的悍妒。

女色祸国说一指杨贵妃迷惑君心，使唐玄宗沉溺声色不理朝政，一指杨贵妃与安禄山的非正当关系使安禄山起反叛之心，二者的结果都是导致盛唐不复存在，所以杨贵妃自然是罪魁祸首。

唐玄宗晚年沉溺声色，不理朝政，将军国大事交于权臣处置，《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记载："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③]白居易的"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④]虽是夸张之诗语，却不失历史的真实性。陈鸿的《长恨歌传》写道："时省风九州，泥金五岳，骊山雪夜，上阳春朝，与上行同辇，止同室，宴专席，寝专房……非徒殊艳尤态致是，益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⑤]作者写唐玄宗对杨贵妃专宠，不只是因为她的美，更是因为她能揣摩玄宗的心意，还善于魅惑，这是对杨贵妃明显的批判。《惊鸿记·叙》云："夫祸莫大于杨氏之覆唐矣。"[⑥]也将杨贵妃作为扰乱国政的祸水红颜。

关于杨贵妃与安禄山，两唐书和《安禄山事迹》中均载有"贵妃养儿"之事，《资治通鉴》也有"贵妃洗儿"的记载，杨贵妃于马嵬死后，安禄山"不觉数叹"。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杨贵妃与安禄山的关系非同一般。因此后世文学作品中，有关二人的事迹也不断衍化。宋代秦醇的《骊山记》是最早记述二人暧昧故事的作品。安禄山因受玄宗赏识，可自由出入于宫闱，因此"常与（贵妃）游者禄山也"，"贵妃虑其丑声落民间，乃以禄山为子"[⑦]。安禄山在醉戏之时，时有对贵妃"无礼尤甚"的举动。在镇守渔阳之前将与贵妃别，安禄山语贵妃："此别复有相见之期乎……万死万生犹不顾，臣须来见娘娘"且"涕泣交下……良久不止"。[⑧]后安禄山谋反时言左右曰："吾之此行……但欲杀国忠及大臣数人，并见贵妃叙吾别后数年之离索，得回住三五日，便死亦快乐也。"[⑨]《梧桐雨》中将安禄山反

① 康保成点校：《明清传奇选刊·惊鸿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页。
② 鲁迅校录，王中立译注：《唐宋传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482页。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914页。
④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661页。
⑤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656页。
⑥ （宋）刘斧：《青琐高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⑦ （宋）刘斧：《青琐高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
⑧ （宋）刘斧：《青琐高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
⑨ （宋）刘斧：《青琐高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

叛的原因也归为欲得贵妃："我今只以讨贼为名，起兵到长安，抢了贵妃，夺了唐朝天下，才是我平生愿足"、"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①]由此可见，这些作品对杨贵妃的批判着眼于她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正是他们的"勾结"加快安禄山叛乱的节奏。

（三）天生丽质，至情至真：对杨贵妃的褒扬

关于杨贵妃的容貌，《旧唐书》卷五十一《后妃上》载："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②]《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绝世无双……太真肌态丰艳，晓音律，性警颖。"[③]由此可见杨贵妃之美名副其实。此外，历代诗文中对杨贵妃的美貌也多有称赞。

安史之乱前，盛唐诗人对杨贵妃的书写以李白的《清平调词三章》和《宫中行乐词八首》为代表。时李白供奉翰林，深受玄宗礼遇，这几首诗歌都是奉玄宗之命盛赞杨贵妃之美。诗歌中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成为形容杨贵妃之美的千古名句。从杜甫在《丽人行》中对杨氏姐妹娇态的描写、《哀江头》中的"明眸皓齿"都可看出，杨贵妃就是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人。

杜甫之后，白居易的《长恨歌》作为中唐时期书写李杨爱情故事的传世佳作，对杨贵妃美貌的赞美可以说是极尽描摹之能事："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④]《骊山记》中作者借老翁之言，对杨贵妃的美貌有这样的描写："中人贵妃发委地，光若传漆，目长而媚，回顾射人。眉若远山翠，脸若秋莲红。肌丰而有余，体妖而婉淑。唇非膏而自丹，莫非烟而自黑。真香娇态，非由梳掠。乃物比之仙姬，非人间之常体。"[⑤]这里的杨贵妃也是美若天仙。类似这样赞美贵妃之美的诗文大都是对贵妃体貌、才智的称赞，此不赘述。

另有褒扬贵妃的是有关贵妃的至情至真。《长恨歌》中杨贵妃对玄宗使者表明心意的描写："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⑥]足见杨贵妃之至情至真。尽管被所爱之人赐死，可是她对他情比金坚，她有着"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坚贞不渝。《杨太真外传》中，玄宗忍痛赐死贵

① 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②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78页。
③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862页。
④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661页。
⑤ （宋）刘斧：《青琐高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⑥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661页。

妃之时，贵妃言："愿大家好住。妾诚负国恩，而无恨矣。"[①]丝毫没有让玄宗为难的意思，其大义凛然可见一斑。《梧桐雨》中杨贵妃临死之前对玄宗说的话是："妾死不足惜，但主上之恩，不曾报得，数年恩爱，教妾怎生割舍？"[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杨贵妃在死前顾念的的仍是她和唐玄宗的情分，这样的深情怎能不令人唏嘘！

将杨贵妃的至情至真演绎到极致的莫过于洪昇的《长生殿》。剧中杨贵妃不仅与玄宗有着生生死死的爱情，更有救国之大义。面对不能与玄宗白头偕老的悲剧，她甚至后悔拥有这一段情缘："若早知为断绠，枉自去将他留下了这伤心把柄……但提起那恩情，怎教我重泉目瞑！"（《情悔》）[③]这后悔是因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而生的幽怨，这里的杨贵妃无疑是一个"情痴"的形象。《埋玉》一出中，马嵬兵变，杨贵妃不是被玄宗赐死，是她主动向玄宗"请死"以稳君心，保宗社，其慷慨赴死以救国是洪昇对"女色祸国"的彻底否定："臣妾受皇上深恩，杀身难报，今日势危急，望赐自尽，以定军心陛下得安稳至蜀，妾虽死犹生也。算将来无计解军哗，残生愿甘罢，残生愿甘罢！……陛下虽则恩深，但事已至此，无路求生。若再留恋，倘玉石俱焚，益增妾罪。望陛下舍妾之身，以保宗社。"[④]杨贵妃在洪昇笔下，不仅是情圣，更是舍身救国的英雄，这是对杨贵妃形象的全新塑造，也是对杨贵妃的最高赞美。

综上可知，中唐诗人对李杨爱情的书写，涉及多个层面，且多脱胎于白居易的《长恨歌》。《长恨歌》虽不是最早的书写李杨故事的作品，但它却广泛流传，成为后世杂剧、诸宫调、戏曲作家多次选用的题材，这无疑加速了"杨贵妃"这一文学母题的形成。

第三节　以情为主到以理为主

以韦应物为代表的大历诗人在追忆盛唐时承袭了左思"借史事以咏己之怀抱"的路子，常表达出时光流逝、人生如寄的失意之情。在赠故交的诗中，他感慨"方来属追往，十载事不同"[⑤]，"自叹犹为折腰吏，可怜骢马路傍行"[⑥]。李端在《赠李龟年》诗中写道："风流随故事，语笑合新声。独有垂杨树，偏伤日暮情"[⑦]……

① 鲁迅校录，王中立译注：《唐宋传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
② 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③ 徐朔方校注：《长生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④ 徐朔方校注：《长生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⑤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⑥ 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⑦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251页。

应注意到，由大历到贞元、元和，从顾况的“却来书处在，惆怅似前生”[①]到元稹的“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②]，中唐诗人咏盛唐诗经历了以情为主到以理为主的转变。从审美角度而言，这种变化是追忆和遥想之间的“距离”所致，也是诗人“功利性”书写的表现，同时，理性因素的增加又影响了晚唐诗人的创作。

一、时空距离的影响

“距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既指时间或空间上相隔的长度，又指认识、情感上的差距。在文艺心理学中又有“心理距离”之说，主要是指审美主体“不为忧患休戚的念头所扰，一味用客观的态度去欣赏它（审美客体）”[③]在这里主要讨论时空距离对中唐诗人书写盛唐的影响，即大历诗人因距离盛唐近而追忆盛唐，元、白等诗人因距离盛唐远而遥想盛唐。

相比较而言，大历诗人对盛唐充满更真挚的怀念之情，经历过开元年间的太平盛世，感受过时代带给他们的自豪感，盛唐的消逝带给他们的冲击会更大，因此无论是哀叹还是怀念，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他们的诗歌中多流露出对盛世的眷恋和惋惜，其间渗透着诗人作为盛衰之变的见证者的身世之感。而之后的中唐诗人多以批判的眼光看盛唐，盛唐在他们笔下似乎只能是引以为戒的对象，玄宗沉溺声色、奸臣当道、贵妃专宠、战争频仍……诗人在咏盛唐的诗中更多地关注现实、刺事伤时，即“经古人之成败以咏之……读史见古人成败，感而作之”。[④]诗人们以玄宗朝的人事为吟咏对象，反思山河破碎的原因，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时代焦虑感，以史为鉴的反思中对历史兴亡的伤悼之情并不如大历诗人那样浓厚。

这其中的原因与时代距离造成的情感变化不无关系。金人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卷三四《文辨一》中云：“凡为文有遥想而言之者、有追忆而言之者。”[⑤]这是将作家为文分为遥想与追忆。遥想侧重于想象，即“脑海中浮现出眼前不存在的世界”[⑥]；追忆则是基于事实基础上的回忆。大历诗人们书写盛唐是对亲历盛唐又目睹其衰亡这段记忆的追溯，大历之后的中唐诗人书写盛唐则带有一种“距离与想象”，时间的推移造成了诗人与其诗歌所描述的对象的距离，也因此造成了情感态度上的差异。此外，盛唐的消逝使大历诗人沉浸在无尽的痛苦中，还来不及反思其中的原因，之后的中唐诗人处在混乱的社会环境中，不得不面对现实，

① 王启兴、张虹注：《顾况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06 页。
②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中册，第 737 页。
③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 128 页。
④ （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年版，南卷《论文意》，第 135 页。
⑤ （金）王若虚著、胡传志、李定干校注：《滹南遗老集》，辽海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88 页。
⑥ （日）浅见洋二：《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26 页。

反观历史，最直接的就是把时代距离最近的盛唐作为批判对象，因此他们一改传统的高古而卑今的态度，在理性的反思中书写盛唐。他们笔下的盛唐是经过筛选和艺术加工过的盛唐，经过重塑的盛唐不再如大历诗人眼中那般恢宏，而是弊端丛生、需要统治者以之为戒的盛唐，对盛唐的遥想中隐含着他们对现实的失望与期待。

大历主情到元和主理的变化缘于时代的变迁，从审美角度来说，体现了时间和空间对诗人艺术创作的双重影响。同样是书写盛唐，大历诗人们是站在经历过盛唐的角度追忆盛唐，元、白等诗人则是站在自己所处时代的角度遥想盛唐。时空的距离造成了他们对盛唐书写分别持有怀念和批判的态度。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中指出“空间和时间也是‘距离’的两个要素。……艺术是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同是一个作品，在某一时代中因为‘距离’太近，看起来是写实的，过一个时代，因为‘距离’较远，实际的牵绊被人遗忘了，所留的全是一幅图画，就变成富于浪漫色彩的作品。”[①]对于同一个审美对象——盛唐，韦应物等大历诗人因为较近的时间距离，对盛唐的书写是建立在自己真实经历的基础上的，由此所产生的心理感受也更为真切。大历诗人之后以元、白为代表的中唐诗人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历史记载、民间传闻等书写盛唐，更多的是反思历史。如前所述，以唐代诗人对李杨爱情故事的书写为例，李白、杜甫生活在盛唐时代，无论是李白对杨贵妃倾国倾城之美的描绘，还是杜甫对杨氏家族炙手可热的权势的揭露，都是更接近于历史事实的。之后的中唐诗人韦应物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玄宗游幸华清宫时奢华场面的描写也是历史事实的再现。

对元稹和白居易而言，盛唐社会并不存在于他们的记忆中，因此他们只能在遥想中批判和反思历史。“审美主体需要在冷静客观的心理状态之下，将自我的情感、经验移入其中，通过联想、想象及其它心理加工方式，对对象加以融合、重铸，使之成为新的‘美感形象’。这种经验是从生活中获取的，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有个性的、有人情味的，这就又拉近了与生活的距离。”[②]元、白二人对盛唐的书写不是单纯地书写盛世局面，反而意欲通过盛世的衰颓补察时政。他们与盛唐的时代距离相去较远，生活在混乱中唐社会现实中，他们不得不以冷峻的态度书写盛唐，分析盛世走向倾颓的原因。盛唐人事在他们的书写中被想象和加工，变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这样的遥想书写中，因虚构和想象使审美对象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元稹《连昌宫词》中对玄宗和贵妃奢华生活场面的描写、对歌舞升平的宫廷生活的描写都是诗人对历史的想象。事实上，李杨二人并未亲临连

①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38页。
② 邓云：《“心理距离说”再思考》，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2页。

昌宫，就连元稹本人是否亲眼所见连昌宫后来的荒芜景象都难以有定论，诗人却能将昔日之繁华与今夕之破败书写得犹如身历其境，其中想象、联想的加工过程赋予审美对象以浪漫色彩。这些想象和联想中承载着历史的真实和诗人对历史与当下的反思。

二、“功利性”书写的表现

无论是以情为主还是以理为主都是诗人“功利性”书写的表现。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从目的上来说有无功利性与功利性两种表现。“文学往往直接地是无功利的，即审美不寻求直接的实际利益满足。……但是，文学的无功利性‘背后’又总是存在着某种功利。文学直接地是无功利的，但间接地或内在地却又隐伏着某种功利性。”①

从文学作为作家的社会话语活动来看，中唐诗人书写盛唐，一方面是直接地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另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书写间接地再现社会生活。这二者都是诗人功利性书写的表现。韦应物等大历诗人在诗歌中描写盛唐的各种奢华场面，再现盛唐的繁荣昌盛，是因为时代的变迁使自己不可能再重回盛世，境遇的不顺让诗人不得不通过诗歌将这种愁苦、悲观、失落、怀念的情感表达出来，因此才有了对盛唐的书写。“无功利的触景生情实际上在深层也有着功利目的在：个人的失意感怀被提升到中国文人的一种普遍的精神高度。”②他们在诗歌中表达的仕途失意之感、时移世易之叹是古代文人普遍的情感体验。

“作为再现现实社会生活的话语结构……文学的功利性是要实现强烈的功利目的。文学虽然主要是具有无功利性，但它由于在其话语结构中显示了社会现实。社会关系的丰富与深刻变化，因而间接地也体现出掌握现实生活这一功利意图。”③元稹、白居易对盛唐的书写中即隐含着这种直接的功利性。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明确表达创作新乐府的目的：“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④，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也称自己是“取其时病尤急者，列而和之”⑤。他们书写盛唐的功利性目的在于希望发挥诗歌的美刺作用，针砭时事，通过对盛唐的批判书写使统治者知民意、晓民情，认识到当今社会的弊端，及时革除弊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中唐诗人对盛唐的书写从表面上看只是对盛唐之世的怀念或批判，但其实隐

---

①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第 57 页。
②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第 59 页。
③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版，第 59 页。
④ 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版，第 5 册，第 2789 页。
⑤ 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版，中册，第 717 页。

含诗人的功利目的，直接地抒发感情或是间接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都使书写盛唐的诗歌意蕴更为深刻。

三、对晚唐咏史怀古诗作的影响

以情为主到以理为主的变化，表现在咏史怀古诗歌中议论成分的增加，叙事、议论、抒情的结合，为晚唐咏史怀古诗提供了借鉴。

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①]前人咏史怀古多以述史和抒情为主，明确发表议论的情况并不多见。至杜甫，其咏史怀古诗中除表达个人情思外，常有篇幅较多的议论，如作于夔州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五几乎是通篇议论。受杜甫这位诗歌集大成者的影响，咏史怀古诗歌发展到中唐，议论成分明显增多，中唐诗人在书写盛唐时也是如此。如李益《过马嵬》中"汉将如云不直言，寇来翻罪绮罗恩"[②]、《过马嵬二首》其一中"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③]皆以明确的议论表达作者的价值判断。元稹和白居易审视了盛唐由盛转衰的命运，在新乐府中也以"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的议论表达明确的现实指向，如元稹的"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遣"、"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谋休用兵"，白居易的"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歌明主"、"老人言，君听取……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等。之后的诗人如张祜等针对玄宗朝人事评述得失的诗歌，更是不在少数。

结合王立对咏史怀古诗歌创作高潮出现的原因分析，中唐诗人书写盛唐也"恰恰是时代总体上的现实规定性最不合于文人群体内心理想模式的时候。对既往的否定哀伤，又是对现实的揭露针砭。"[④]面对更加令人失望悲观的社会环境，中唐诗人一方面把咏史怀古诗作为警示统治者的手段，在咏史怀古诗歌中投入更多的现实关怀和理性冷峻的思考，对古人之得失作出直接评判，另一方面把咏史怀古诗作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抒发悲愤情绪的工具。这种情绪延续到晚唐，较中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会没有受到中唐诗人书写盛唐的影响。李商隐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⑤]对统治者不重视人才的做法进行辛辣的讽刺和批判。杜牧的《题乌江亭》："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⑥]中，对历史的假设中蕴含诗人理性的思考。《泊秦

① 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58页。
② 范之麟：《李益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③ 范之麟：《李益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7页。
④ 王立：《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230页。
⑤ 刘学锴、余恕诚著：《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89页。
⑥ 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36页。

淮》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①]讥讽陈后主荒淫误国以刺今。

晚唐诗人在咏史怀古中亦能对历史进行"翻案"，而不是一味因循前人观点。在对待杨贵妃的态度上，罗隐直言："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贵妃"[②]。黄滔的《马嵬》诗云："锦江晴碧剑峰奇，合有千年降圣时。天意从来知幸蜀，不关胎祸自蛾眉。"[③]二者皆认为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原因根本不在杨贵妃。尽管此种观点在中唐就有，但是晚唐诗人在咏史怀古中常进行理性的思考，试图总结出历史兴衰的某种必然规律，因此他们对盛唐衰败的反思更多的是批判玄宗，而非简单地以"女祸"作为亡国之因。晚唐诗中也有为隋炀帝"平反"的，如皮日休的《汴河怀古》之二："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④]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劳民伤财，导致隋朝灭亡，作为历史上有名的荒淫残暴之君备受后人批判。而皮日休在这首诗中却大胆假设：如果没有大造"水殿"、"龙舟"游幸江都之事，隋场帝开凿运河，造福后世的功绩简直可以和大禹相提并论了。这样的思考既没有否定隋炀帝的罪状，又对他的功绩进行了肯定，其理性思维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中唐诗人对盛唐的书写，从大历诗人的以情为主到元白等人的以理为主，也反映出时代对诗人的影响。对于刚经历乱离的诗人来说，怀古之忧伤是挥之不去的，而从忧伤中走出来的诗人就不得不面对现实，从历史中探索朝代兴亡之规律，希求太平盛世。这种由感性到理性的变化，使咏史怀古诗歌中的议论成分增加，也影响到了晚唐诗人的创作。

---

① 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中华书局，2008 年版，第 517 页。
② 雍文华辑校：《罗隐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 157 页。
③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 8131 页。
④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 7099 页。

结 语

中唐诗人书写盛唐是时代环境所致，也与诗人的自身经历有关。盛唐政治的清明、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高度发展使经历过盛唐的中唐诗人在诗歌中再现盛唐的繁华与恢宏气象，书写盛唐的盛事、故地，流露出更多的怀念与眷恋之情。以元稹、白居易等为代表未经历盛唐的中唐诗人，秉承着传统士大夫的责任与良知，以批判的态度书写盛唐的战事、将相任用等，从而针砭时弊，给予当今统治者以警示。

中唐诗人对盛唐之世的书写是咏史怀古主题的延续。在诗歌中，诗人多将时、地、人、事相结合，时空的转换，古今的对照更能凸显出感情的复杂。盛世不再的哀伤、对李杨爱情的遗憾、惋惜、或同情，对现实社会的担忧，都使诗歌流露出普遍的感伤情绪。中唐诗人对李杨故事的书写，影响最大的非《长恨歌》莫属。关于《长恨歌》主题的研究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讽喻说、同情说、遗憾说等等在中唐诗人的诗歌中都有表达。与之不同的是，晚唐及以后的诗人又产生了“翻案说”，反对将李唐王朝的命运归咎于杨贵妃，甚至在文学作品中将杨贵妃的形象一再改写，使之成为被歌颂的对象。中唐以后的李杨故事书写，结合文学的时代特色，加入了更多的想象成分，也与真实的历史相差甚远。这些书写促进了“杨贵妃”这一文学母题的形成。

从大历诗人的怀念到元白等的批判，经历了以情为主到以理为主的变化，这一变化与时代因素是分不开的。作为安史之乱的亲历者的中唐诗人沉浸在乱后的伤痛中，来不及反思历史，而元白等诗人面对中唐的社会现实，迫切需要从盛唐由盛转衰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因而以理性、冷静的态度批判盛唐。诗歌中个人情感的抒发和对社会现实的间接反映都是中唐诗人功利性书写的表现。其中理性思维的呈现，使诗歌中的议论成分增加，也影响了晚唐咏史怀古诗的创作。

时代环境影响诗人，进而影响诗歌创作，诗歌创作又反映诗人的生存境遇和处世心态，这些因素无形中推动着诗歌的发展，积淀着我国古代文学的丰厚底蕴。中唐诗人书写盛唐的诗歌中也有相应的新变，体现着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从另一层面来说，中唐诗人对盛唐的书写是诗歌发挥其历史记忆功能的表现。这一功能主要通过对盛唐历史的记忆与书写来实现。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记忆是人类基本的心理活动过程，是大脑对自身经验的记录，包含人类对过去经历的认知和感受。除此之外，记忆能够促使记忆者形成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从而形成群体的共同记忆。大历诗人因为经历过盛唐，形成对盛唐的记忆，所以对盛唐的书

写与真实的历史更为接近。元、白等稍后诗人虽然未曾经历盛唐，对盛唐的书写是一种“遥想”，但他们结合了结合自身生活经验、历史记载与传闻，这样的书写同样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的。两个时期的诗人在诗歌中关于盛唐人、事、地的书写多是有事实依据的。他们的盛唐书写承载着盛唐的历史记忆，丰富着人们对盛唐历史的认知。晚唐及以后文人对盛唐书写的回应和继承，使这种书写具有更重要的历史意义。

大历诗人对盛唐的记忆性书写与元、白等人对盛唐的想象性书写，并不是单纯地再现过去、追想往昔的客观性书写，而是诗人站在当下立场对历史的重新建构。历史记录与文学想象的结合使诗歌中的历史在虚构和想象之外依然保有其真实性，承载着时代对历史的反思与寄托，是文学书写历史、反思历史的表现。这一书写缘于历史记忆，又超越历史记忆。

中唐诗人书写盛唐是时代影响下的书写，带有时代的烙印。通过中唐诗人书写盛唐的诗歌，我们可以更好地接近历史、把握历史、理解历史、感悟历史。同样地，正因为这些诗歌承载着对历史的记忆和反思，我们在解读这些文本的时候，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其语词表面，而是要回归文本的历史语境，考察历史被“重塑”的深层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与文本的对话，认识诗人建构历史的意图。

参考文献

一、古代典籍：

[1] (三国)曹操著,夏传才注.曹操集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2] (西晋)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 (唐)李肇.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 (唐)李白撰,瞿蜕园.朱金城等校注.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 (唐)戎昱著,臧维熙注.戎昱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 (唐)罗隐撰,雍文华辑校.罗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 (唐)李益著,范之麟.李益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8] (唐)张继著,周义敢.张继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 (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0] (唐)李商隐撰,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1] (唐)刘禹锡著,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2] (唐)卢纶著,刘初棠校注.卢纶诗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3] (唐)韦应物著,陶敏,王友胜.韦应物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4] (唐)顾况著,王启兴,张虹注.顾况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5] (唐)王建著,王宗堂校注.王建诗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16] (唐)杜牧撰,吴在庆校注.杜牧集系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7] (唐)韩愈著,刘珍纶,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8] (唐)元稹著,周相録校注.元稹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9] (唐)韩愈著,(清)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0] (唐)杜甫著,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1] (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2] (五代)王仁裕等撰,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3] (宋)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2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5]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6] (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7] (宋)刘斧.青琐高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8] (宋)洪迈. 容斋随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29] (宋)宋敏求撰, 辛德勇, 郎洁点校. 长安志[M].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13.
[30] (金)王若虚著, 胡传志, 李定干校注. 滹南遗老集[M]. 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6.
[31] (明)徐师曾著, 罗根泽校点. 文体明辨序说[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32] (清)彭定求编.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 1960.
[33] (清)赵殿成笺注. 王右丞集笺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1.
[34] (清)董诰等编.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35] (清)赵翼. 廿二史札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84.
[36] (清)洪昇著, 徐朔方校注. 长生殿[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二、今人论著:

[1] 褚斌杰. 白居易评传[M].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7.
[2] 郭绍虞编选, 富寿荪点校. 清诗话续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3] 乐黛云. 中西比较文学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4] 傅璇琮主编. 唐才子传校笺[M]. 北京:中华书局, 1989.
[5] 戴伟华. 唐代幕府与文学[M]. 北京:现代出版社, 1990.
[6] 季羡林.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7] 陈建宪. 神祇与英雄[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8] 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9] 孟二冬. 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0] 顾学颉选注. 元人杂剧选[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11] 罗宗强.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
[12] 胡适. 白话文学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13] 程毅中. 宋元小说研究[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14] 霍松林, 傅绍良. 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5] 傅璇琮. 李德裕年谱[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16] 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17] 王立. 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M]. 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2.
[18] 鲁迅校录, 王中立译注. 唐宋传奇集[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
[19] 尚永亮. 贬谪文化与贬谪文学——以中唐元和五大诗人之贬及其创作为中心[M].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3.
[20] 康保成点校. 明清传奇选刊. 惊鸿记[M]. 北京:中华书局, 2004.
[21] 王立. 中国古代文学主题思想研究[M].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8.

[22] 陈建华.唐代咏史怀古诗论稿[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23] 张润静.唐代咏史怀古诗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24] 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5] (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26] 郑海译.(美)st.汤普森.民间故事分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27] (日)浅见洋二.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8] 郑学勤译.(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三、期刊论文:

[1] 吴伟斌.元稹与宦官[J].苏州大学学报,1986,(01).
[2] 杨恩成.论唐代咏史诗[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1).
[3] 雷恩海,吴定泫.明丽青春的追求与迷惘——盛唐咏史诗述论[J].复旦学报,1999(02).
[4] 王玄玉.唐玄宗与华清宫[J].乾陵文化研究,2006(03).
[5] 朴玉.承载历史真实的文学想象——论《愤怒》中的历史记忆书写[J].当代外国文学,2014,(04).
[6] 吴伟斌.元稹《连昌宫词》新解[J].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03).
[7] 何蕾.中唐“夷夏”观念之转严与边塞诗创作的衰落[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02).

四、学位论文:

[1] 李翰. 汉魏盛唐咏史诗研究[D].复旦大学,2005.
[2] 胡杏.论晚唐诗人的历史情结[D].华侨大学,2007.
[3] 陶成涛. 唐代曲江诗研究[D].中山大学,2010.
[4] 郑琛.现实与追忆—长安、金陵与唐诗人的都市文化心态[D].广西师范大学,2013.
[5] 武文娟.中晚唐诗歌中的盛唐记忆研究[D].西北大学,2015.
[6] 郭倩.唐代登临诗研究[D].陕西理工学院,2015.
[7] 尹林.论杜诗的“追忆”倾向[D].陕西师范大学大学,2017.

致 谢

这篇论文到了要收笔的时候了，心中感慨万千。论文从选题到构思，再到定稿，都离不开魏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此首先表达对老师的感谢！

写下这些文字就意味着距离我迈出校门的日子也不远了。要离开的不仅是西安这个城市，陕师大这所学校，更是我朝夕相处三年的老师和同门……一想到这儿，就不觉泪目。

还记得当年所有人劝我放弃报考这所学校的这个专业时，我回答“如果不考陕师大的古代文学，那我就不考研”时的决绝，但只有自己明白在一次次的自我怀疑和鼓励中挣扎的酸楚。如愿以偿的时候，喜极而泣，对未来三年充满了期待，每天都在想象着我会遇到什么样的导师，什么样的同门……缘分真的很奇妙，让我们这些相似的人聚在一起，哪怕仅仅只是遇到这些人，都已经让我不虚此行了。

第一次见导师魏景波的时候，是考研复试。第二次再见，是和同门一起去老师家里聚餐。当时才知道，原来这就是曾经面试我的老师，原来这就是本科学姐口中的“小魏老师”。从那以后，对老师的了解渐渐多了起来，他的谦和、儒雅无形中也影响着我们。在讲授专业知识时候的出口成章与激情澎湃，更体现着老师深厚的学养与对专业的热爱。不得不说的俗套一点，对魏老师的崇拜和敬佩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每每听到其他同学表达对老师的敬意和佩服时，就不由得感慨，自己是何其有幸，能遇到魏老师！在读研的三年时间里，老师每周都带领我们走进古人的世界，感受杜甫的忧国忧民、苏轼的豪迈豁达，领略唐诗宋词的魅力。在课堂上，老师注重培养我们对问题的思考探究能力，我们理解不透的问题都能从老师那儿得到全面的解答。为人处世和学问修养方面，老师教给我的，都令我终生受益。

和同门一起的日子是读研期间最快乐的日子，无论是课上，还是课下，“志同道合”的我们总能收获生活中的许多小确幸。我们可以一起查阅资料，探讨读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可以一起游山玩水，寻找美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他们发现与我的论文有关的资料总是第一时间告知于我，让我收获颇多。谢谢他们的陪伴与帮助让我在西安有更多的归属感。

三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去年六月师姐毕业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老师的临别赠言言犹在耳：“把你最好的人生，最好的光阴，用来读最好的书，接触最好的人，做最值得做的事情……”如今，我只想用八个字来概括这三年时光：“不负我心，不虚此行。”